

戰國至秦的符節 ——以實物資料為主


陳 昭 容

本文中共討論八件楚國「王命=遡賃」節，三件齊國熊、馬、虎節，三件燕國鷹、雁節，皆與戰國傳達制度有關。文中另討論南越王墓「王命=車駟」虎節、秦杜虎符、新郢虎符、陽陵虎符，以及疑偽的東郡虎符，和兩件被誤認為秦兵符的符節，並略述漢代虎符的演變，為戰國秦漢以虎符發兵提供見證。

本文以戰國至秦亡這一段時間為範圍，以可見的符節銘文摹本、拓本及照片為基礎，從古文字學的立場，討論這些符節的銘文、時代、國別、真偽等問題，對這些符節實物給予清楚的定位，並配合相關文獻及新出秦簡、楚簡等資料和各家意見，對古代符節和傳達制度做具體的說明。

一、前 言

符與節皆是一種信物，古代舉凡遣使、出兵、門關、貨賄等，都必須有官方所出的符節，以為憑信。《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𠄎，瑞信也。……（引《周禮·掌節》之文，略）象相合之形」。¹ 漢代許慎以漢制說「符」，又引《周禮》說「節」，究竟符節之制在漢代以前情況如何？其用如何？是一饒有興味的問題。²

1 𠄎，甲骨文作，象人跪姿，非象相合之形，用為「符信」義是假借，後亦假「節」字為之。《說文》「𠄎」字下段注曰「瑞者，以玉為信也……凡使所執以為信，而非用玉者，皆曰𠄎。」

2 一般習慣稱「節」為行使、門關之節信，「符」多特指兵符。然也有兵符稱「節」者，如西漢南越王墓出土之虎形兵符，發掘報告稱之為「錯金銅虎節」，《睡

有關符節的專書，以羅振玉所編《增訂歷代符牌圖錄》（1925年出版）最爲重要，收錄列國至明代符節牌共一百五十五件，其中屬列國者六，屬秦者二。羅氏並在前序中對符牌作一概括性的介紹。³ 此書雖爲符牌圖錄專書，但收羅並不全，仍有不少符節資料散見各家著錄，加以近數十年來亦有新出土者，這些資料實爲漢代以前符節制度提供了具體的實証。

由於資料散見各書，收集匪易，至今仍未見有系統的整理，且相關研究論述極爲零散，⁴ 說法亦間有可商。在本文中，筆者擬綜合敘述戰國至秦符節的一般情況，並從古文字學的角度，討論各符節的銘文、真偽、國別、年代等問題。全文將偏重在實物資料較多的楚及秦，他國情況，囿於材料，較爲簡略。筆者期望對這些符節實物的相關問題做一番整理斟酌的工作之後，對戰國至秦這一段時間內符節的情況，有較清晰的認識。

二、戰國至秦符節的一般情況

《周禮·地官》記有掌節之官，曰：「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

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中的「游士律」稱游士所持通行證爲「符」，《居延漢簡》中甚多出入關之憑信亦稱「符」。《說文》「符，信也」，蓋以「符」爲憑信之總稱。本文中用「符節」爲一般泛稱，非爲特指，也不再細加區別。至於各物或稱「符」，或稱「節」，則依所見著錄原名。

- 3 羅振玉編：《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乙丑冬（1925年）東方學會影印。羅氏在前序中說到前人的著錄及研究時指出「顧（顧氏芸閣刊紅印本《印藪》）吳（吳氏樹滋堂刊本《秦漢印統》）所載，並是贗品；翁（大年《古兵符考略殘稿》）瞿（中溶《集古虎符魚符考》）所考，亦多疏失」。

- 4 關於歷代符牌研究，比較重要的專論有：

- ①王國維：〈秦新郪虎符跋〉、〈秦陽陵虎符跋〉、〈記新莽四虎符〉、〈隋銅虎符跋〉、〈元銅虎符跋〉等，見《觀堂集林》卷十八，《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台二版），頁891-902。
- ②唐蘭：〈王命傳考〉，《北京大學國學季刊》6卷4號（1952），頁61-73。
- ③勞榦：《居延漢簡·考證》〈符券〉（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6年重訂本），頁3-5。
- ④大庭脩：〈漢の銅虎符と竹使符〉，《鎌田博士還曆記念歷史學論叢》（東京：東通社出版部，1969），頁43-54。

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鄭注：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輔之以傳者，節爲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⁵ 又〈秋官·小行人〉曰：「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⁶ 從這兩段記載大致可知其時符節做爲憑信的重要性。所謂「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今日已不得其詳，鄭〈注〉曰：「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鄭玄並舉漢代銅虎符爲說明。但從可見的實物資料來看，做成虎形的符信多爲發兵之用，如新鄭、陽陵虎符以及著錄中的許多漢代銅虎符，並不是一般邦國行使之符節，也有少數非爲發兵之用，如黃濬《尊古齋所見吉金圖》4.47 著錄的蹲踞虎形符節。⁷ 至於可見的龍形符節，多作長條牌狀，頂飾以龍形，從其銘文字體及出土地來看，應爲戰國楚地之一種通行憑信，合於「澤國用龍節」之記載，但也很難確定是否爲邦國行使之符節。

文獻記載常以焚節折符說明兩國斷絕邦交，例如《史記·楚世家》記張儀離間齊楚，「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⁸ 《戰國策·燕策一·齊伐宋宋急》記蘇代勸燕昭王霸齊盟周而「盡焚天下之秦符」，⁹ 同書〈西周·雍氏之役〉蘇代設計使周背秦親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魏策二·五國伐秦〉

5 《周禮》（十三經注疏本）卷十五，頁11-13。

6 《周禮》卷三十七，頁24-25。

7 《尊古齋所見吉金圖》4.47 著錄的虎形符銘文「王命=遯賃」，與龍節銘文全同，應非兵符，詳後。

8 《史記》（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四十〈楚世家〉，頁1724。

9 《戰國策》卷二十九〈燕策一·齊伐宋宋急〉（台北：九思出版公司，1978），頁1068。《馬王堆漢墓帛書》（參）〈戰國縱橫家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簡214記同一事件曰：「使明（盟）周室而焚（焚）秦符」。

「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¹⁰ 這些例子說明了符節象徵兩國邦交，具有實質上的重要意義。

《周禮》中另記載了門關、貨賄、道路等不同的符節，在〈司關〉中對於門關、貨賄另有詳細的規定：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鄭注：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鄭注：不出於關謂從私道出辟稅者，沒其財而撻其人）。凡所達貨賄，則以節傳出之（鄭注：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無門關之征謂出入門關無租稅；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凡四方之賓客敏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¹¹

嚴謹門關，自然是與防奸人出入有關，但與關稅之徵收，也有密切關係。《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有一條相關的法規：

「客未布吏而與賈，貲一甲。」可（何）謂「布吏」？ ·詣符傳於吏是謂「布吏」。（簡 184）¹²

外來的邦客必先交符傳給官吏，始可開始有商業行爲，其著眼處自然是在稅收。

這樣的符傳實物，可能因以竹木爲之，沒有特意保藏而腐朽敗壞，今日已不可得而見，只能期待他日或有可能出於地下。1957年安徽省壽縣城東丘家花園村出土的鄂君啓車節、舟節，雖非一般商賈的通行符節，但其中所述，對於戰國中期楚國商業、交通等，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新資料。¹³ 鄂君啓車節、舟節鑄於楚

10 《戰國策》卷二〈西周·雍氏之役〉，頁53。同書卷二十三〈魏策二·五國伐秦〉，頁830。

11 《周禮》卷十五，頁8-10。

12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137。

13 關於鄂君啓節的研究論述甚多，有關出土資料可參考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金節”〉，《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頁8-11。

懷王六年（323 B.C.），是楚懷王頒給鄂君啓水路、陸路經商的通行憑証及免稅証明。節以青銅鑄造，外形仿竹節，上有錯金銘文，對於鄂君經商路線、時間、商品種類、數量及禁運物品、需完稅貨物、傳舍待遇等，都有具體的規定。銘文上曰：

得其金節則毋（毋）正（征），毋（毋）舍糒（傳）飢（食），不得其金節則政（征）。

鄂君啓為楚國封君，是楚國的貴族，因而享有如節文所說的免稅經商特權。從楚王如此慎重鑄金節來看，這樣優厚的免稅特權可能在貴族中並不普遍，遑論一般商賈。¹⁴

至於一般出入的通行憑証，先秦文獻中以《墨子》所記較詳，例如：

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號令〉）

與階門吏為符，符合，入，勞；符不合，收，言守。（〈號令〉）

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號令〉）

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驗之。節

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雜守〉）¹⁵

這些文字記載了對出入門關諸色人等及一般往來行者查驗通行憑証，甚為詳細。

執行查驗的這些「主節」者，若有失職，官方也有處分的規定。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記載沒有符券的游士居留，所在的縣要「貲一甲」。¹⁶ 如果沒有及時發現偽造的通行証，要「貲二甲」。¹⁷ 若丟失符券，也要論罪，即使後來

14 參見陳偉：〈鄂君啓節與楚國的免稅問題〉，《江漢考古》1989年3期，頁52-58。

15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06-107、116、150。

16 「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頁80。〈釋文〉以「游士」為「專門從事游說的人」，裘錫圭：〈讀簡帛文字資料雜記·睡虎地秦簡四則〉（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一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頁27）認為「游士」是「外來的、沒有固定戶籍的人士」。當以裘說為是。

17 「發偽書，弗智（知），貲二甲。今咸陽發偽傳，弗智，即復封傳它縣，它縣亦傳其縣次，到關而得，今當獨咸陽坐以貲，且它縣當盡貲？咸陽及它縣發弗智者當皆貲。」《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頁107。

又找到，也不能免罪。¹⁸ 《說文》「貲，小罰以財自贖也」，秦律中廣泛使用這種處罰方式制裁失職官吏。貲一甲，貲二甲，相對於秦律中的各種刑罰，這算是處分較輕的一種。戰國時列國對主節者失職的處分與秦有何異同，則不得其詳。

由於戰國「以竹爲之」的符節，今日已不可得見，有學者遂從鄂君啓節去推測戰國符節的情況，殷滌非、羅長銘將鄂君啓車節三件據實物弧度拼合成一個大半圓的竹簡，若合五件正可拼成一圓形竹簡；舟節只出一件，若合五亦可拼成一段圓形竹簡。¹⁹ 郭沫若引應劭《漢官儀》云「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認為鄂君啓節每套五枚，兩套合共十枚，正是古代符節相沿的制度，剖竹爲五，而不對剖成二或四，是避免容易作偽。²⁰ 這個說法言之成理，但一時無法確實證明。郭氏又進而推論曰：

在較古的時代，所有的符節該都是以竹或木爲之的。竹是南方的產物，可以想見竹節或竹符必用于南方。北方諒必多以木，用木則可以雕刻成種種的形狀，故有虎節、人節、龍節之分。可見《周禮·秋官》的六節正是南北習俗的混合物，到了青銅器時代便改用銅鑄，故不僅虎符等是「以金爲之」，鄂君啓節儘管是竹符，也是「以金爲之」了。「以金爲之」而猶採取竹節的形式，即表明著由竹而「金」的演變過程。戰國時代的竹節都已經「以金爲之」，更可以想見東漢末年的「竹使符」，名雖是竹，亦必然是金質。²¹

筆者的看法與郭氏不同。《周禮》的虎節、人節、龍節、旌節、符節、管節雖並稱「達天下之六節」，但應有層次之分，虎節、人節、龍節係邦國之使節所持，應出自中央，故「以金爲之」；並以「英蕩輔之」，²² 以示慎重。至於道路、

18 「亡久書、符券、公璽、衡羸（纍），已坐以論，後自得所亡，論當除不當？不當。」《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頁127。

19 同註13。1960年又發現舟節一件，總計車節三件（同文）、舟節二件（同文），見商承祚：〈鄂君啓節考〉，《文物精華》第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頁49。

20 郭沫若：〈關於鄂君啓節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頁3。

21 同上註。

22 「英蕩」之義，各家說法不同，茲暫採杜子春之解釋，是「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

門關、貨賄等通行憑証，游士商賈、賓客邦徒諸色人等皆需持節以進出，發給節傳之單位恐不必盡由中央。《周禮·掌節》「門關用符節…，皆有期以反節」句下鄭注云：「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人，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這說明一般人出入的節傳是由地方單位所出，其如〈秋官·小行人〉所說「以竹爲之」的可能性較大，以金爲之恐怕不容易。《墨子·號令》篇提到「符傳疑」，《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有「發僞傳」，從有詐僞的角度來看，地方單位發出的竹木節傳易於作假。像鄂君啓節這樣的金節，是楚王特別頒給封君的特權，所以製作如此慎重，不僅詳述製造之時地，還要述明負責製作之工官名姓，尙且要錯金文字。鄂君啓節之以金質仿竹節形制，更能說明一般門關貨賄符節可能是竹節形，而鄂君啓節係由王所頒布，故特別慎重。郭沫若據鄂君啓節而認爲戰國時代的符節都以金爲之，可能不盡合於事實。漢簡中有不少漢代通關符券，皆非金質，可以參看。²³

以下要談的是兵符。《周禮·春官·典瑞》謂「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²⁴ 蓋以「牙璋」爲發兵之依據。〈考工記·玉人〉也謂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注云「有鉏牙之飾於琰側」。²⁵ 「鉏牙」的作用大概類似虎符兩片相接處之牝牡榫，鉏牙相合乃爲憑信。目前我們對於牙璋的形制及作用已不能確知其詳，今日可見的戰國及秦兵符，皆作虎形，《史記·魏公子列傳》記載魏無忌請如姬從王臥內所盜之兵符，亦爲虎形。²⁶ 秦王子嬰投降劉邦時「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²⁷ 所奉出的不僅是行政權、外交權，還有兵權。²⁸ 其中的「符」，可能就是今日我們仍可見到的秦兵

23 《居延漢簡·圖版》（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57），第一葉65.7；第60葉29.1；29.2等。

24 《周禮》卷二十，頁22。

25 《周禮》卷四十一，頁6。

26 《史記》卷七十七〈魏公子列傳〉，頁2380。

27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頁362。

28 「封皇帝璽符節」下，索隱引韋昭注：「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節，使者所擁也。」

符一造形生動、製作精美、錯金文字的「虎符」。《史記·孝文本紀》、《漢書·文帝紀》都記載文帝二年（178 B.C.）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²⁹ 似乎文帝以前不以虎符發兵。然高后去世時（180 B.C.），齊王與中尉魏勃等陰謀發兵以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³⁰ 這段記載與「文帝二年初與郡守銅虎符」相左，不知孰是。但西漢文帝後，發兵概以虎符爲準，武帝建元三年（138 B.C.），東甌告急，武帝以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距法不發。³¹ 由此可知虎符爲發兵常例，以節發兵是權宜措施。「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下，《史記》集解引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漢書》同一句下顏師古注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³² 這是西漢虎符的一般情況。羅振玉《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中著錄不少漢代虎符，近年亦有新出土之漢代虎符，請參看。³³

總括目前可見的戰國及秦之符節，依性質用途約可分爲：（一）免稅通關符節，如鄂君啓舟、車節。（二）與傳遞制度相關的符節，如「王命=遡賃」節和鷹雁馬牛等動物形符節。（三）兵符，包括戰國秦、楚和秦代亡國前之兵符。其中，鄂君啓舟、車節，論者已多且詳，本文中不再討論。另有一些性質用途不明或圖版不清楚的符節，如《周金文存》6下.129著錄的「節」字節、同書6下.128著錄的龍形節，³⁴ 《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2著錄的「辟大夫信節」（見附圖十四上）、³⁵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的「韓將庶信節」（見附圖十四

29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頁424；《漢書》（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四〈文帝紀〉，頁118。

30 《史記》卷五十二〈齊悼惠王世家〉，頁2001。

31 《漢書》卷六十四〈嚴助傳〉，頁2776。

32 同註29。

33 如景明晨、劉曉華：〈咸陽發現漢齊郡太守虎符〉，《文博》1990年6期，頁85-86。

34 龍形節二件，有銘文，字跡不清，唯其中一件有「東周」二字可識，疑爲東周器。鄒安：《周金文存》（上海：廣倉學窘，1921）。

35 此物作伏虎形，僅存右半片，銘文「辟夫=信節」，「辟」字左下「口」內著一短畫，戰國東土文字此例甚多。「信」字「亻」旁豎筆中間著一短畫，與《魏三體

下)，³⁶ 暫不討論。

三、王命 = 遡賃節及與傳遽制相關的符節

「王命 = 遡賃節」見於舊著錄者有七，1946 年湖南長沙市郊黃泥坑墓葬中又出土一件，總計共八件。各著錄中對此物稱呼互異，但以「龍節」之稱較為普遍，蓋以其形為長條狀，上端飾以龍頭，因以為名。本文中以銘文之前半「王命 = 遡賃」節稱之，是因同此銘者，並不全作長牌狀龍首形，如《尊古齋所見吉金圖》4.47 所錄，即為蹲踞虎形，稱「龍節」似不足以概括之。王命 = 遡賃節作龍首長條形者皆為銅鑄，銘文以刀鐫刻，正面銘「王命 = 遡賃」，反面銘「一檣飢之」，「命」下為一重文符，有少數「命」下未見重文符。《尊古齋》4.47 僅有「王命 = 遡賃」銘文，後半未見。以下簡介各家著錄：

(1)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10.5 著錄摹寫銘文，稱「漢龍虎銅節」（見附圖一），銘文「王命遡賃一檣飢之」，阮元案：「蓋軍行遇疫，故王命賃一菴以棲軍之病疫者而為糜藥以飢之也」。³⁷

(2) 馮雲鵬《金石索·金索》據吳門陸質夫藏物著錄器形及銘文拓片，稱「周龍虎節」（見附圖二），銘文「王命遡賃一檣飢之」，「命」下無重文符。馮案：「所云王命道寶，一檣載之者，謂奉王命以此為道路之寶，可建一檣以示威載車而行也」。³⁸

(3)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11.7 著錄器形及銘文拓片，稱「漢龍節」。銘

石經·無逸》「信」字古文同，古璽有此例（羅福頤：《古璽彙編》0232、0235、0236、0248 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此器宜為戰國時列國器，不詳其性質用途。又：請參見本文後記。

36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圖 101「韓將庶銅虎節」，僅存右片，作伏虎形，虎身陰刻銘文「韓將庶信節」等十字，編者認為是韓王調兵的符信（見頁 201 說明）。又：請參見本文後記。

37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清嘉慶間初刊本）。此書另有光緒九年（1883）知不足齋刊本，卷十，頁 6 摹寫之節銘與嘉慶初刊本不同，云「據陳秋棠手搨本摹入」。或疑知不足齋刊本所錄與《綴遺齋》、《小校》、《三代》為同一物，亦無明證。

38 馮雲鵬：《金石索》（道光元年刊本）。

文「王命=遡賃一梏飢之」，劉氏釋為「王命遡賃」「一梏飢之」，並認為「命」下重文符為璽痕。³⁹

(4)端方《匋齋吉金續錄》2.19 著錄器形及銘文之摹寫並拓片，稱「龍節」。

銘文「王命=遡賃」「一梏飢之」，無說。⁴⁰ 此銘文拓片又見於鄒安《周金文存》6.127。

(5)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29.25 著錄銘文之摹寫，稱「龍虎節」，銘文「命」下無重文符。方釋為「王命遡賃」「一梏飢之」。此物拓片又見於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9.106.4，稱「王命車鍵」（見附圖三）、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8.36.4，稱「王命傳車鍵」。⁴¹ 銘文「命」下有重文符。《綴遺齋》所摹恐有遺漏。

(6)黃濬《衡齋金石識小錄》2.24 著錄器形及銘文拓片，銘文「王命=遡賃」「一梏飢之」，無說。⁴² 此物器形及拓片又見於黃濬《尊古齋所見吉金圖》4.46，稱「龍節」。⁴³

(7)流火〈銅龍節〉（《文物》1960年8、9期合刊，頁82）著錄1946年長沙東郊黃泥坑出土龍節銘文拓片，「王命=遡賃」「一梏飢之」。此物現存中國歷史博物館（見附圖四）。

(8)黃濬《尊古齋所見吉金圖》4.47 著錄有蹲踞平版虎形符節，稱「虎節」（見附圖五），銘文「王命=遡賃」五字。柯昌濟《金文分域編》謂此物出於壽縣楚墓，⁴⁴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從上述各著錄看來，銘文以「王命=遡賃一梏飢之」為常，「命」下有重文符，《金石索》拓本、《綴遺齋》摹本無重文符，恐為摹拓時遺漏，劉心源以為璽痕，

39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光緒二十八年石印本）。唐蘭疑此為仿製品。

40 端方：《匋齋吉金續錄》（宣統元年有正書局石印本）。

41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1935年石印本）。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4年上虞羅氏百爵齋據拓本影印）。



42 黃濬：《衡齋金石識小錄》（北平：尊古齋，1935）。

43 黃濬：《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北平：尊古齋，1936）。

44 柯昌濟：《金文分域編》（1930年餘園叢刻本）卷三，頁4。

非是。此節之形制，據黃泥坑所出龍節之報導，通長21厘米，頭寬3厘米，尾端寬1.9厘米，⁴⁵ 其餘各節，據著錄拓片尺量，其長度多在19-21厘米之間，《衡齋》所錄稍短，亦有18厘米。⁴⁶ 節之出土地，可知者有二，一為長沙楚墓，一為壽縣楚墓，從銘文字體判斷，宜為戰國楚物（詳後）。綜上所述，我們大概可推知上述七件龍首飾牌狀符節、一件平版虎形符節，銘文為「王命=邇賃一梡飢之」，是戰國楚物。

「王命=邇賃」節銘文連重文共九字，在釋讀、斷句方面，自清代以來，學者異見甚多，早期如阮元、馮雲鵬、劉心源諸家之說，唐蘭評之為「支離可笑」，⁴⁷ 此處不再辭費。以下僅就近四十多年來比較重要的討論略述如下：

- (1)唐蘭：「王命，命邇，賃一梡（櫓），飢之」。唐氏以第一個「命」為名詞，第二個「命」為動詞，字从亼从人从辵，隸定為邇，讀為「傳遽」之「傳」，隸定為「櫓」，讀為「輕車」之「輜」。全句意為「王命，命掌管傳遽者發馬車，供飲食」。⁴⁸
- (2)李學勤：「王命，命邇（傳），賃一梡，飢之」。「梡」讀為「負」，任一負者，由傳舍供給飲食。⁴⁹
- (3)流火：「王命，命邇賃，一梡飢之」。「邇賃」為官名，「梡」為盛東西的器具，「一梡飢之」意為「給以食宿等的招待」。⁵⁰
- (4)石志廉：「王命，令傳，賃一櫓，飢之」。讀「命=」為「命令」，全句意為「王命令傳舍，對所有乘輜車出行的人給以飲食」。⁵¹
- (5)張振林：「王命，命傳賃，一梡（櫓）飢之」，釋「梡」所从之「𠂔」為「𠂔」之省。全句意為「使者持節所至，該地官吏除按常規給以館舍以外，

45 流火：〈銅龍節〉，《文物》1960年8、9期合刊，頁82。

46 《金石索》（道光元年刊本）所錄最短，僅12.5厘米，疑為石印縮影。

47 唐蘭：〈王命傳考〉，頁63。

48 同上，頁63-65、68。

49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下），《文物》1959年9期，頁60。

50 同註45。

51 石志廉：〈對“銅龍節”一文的商榷〉，《文物》1961年1期，頁72。

還要供給“一檐”的食物。」⁵²

(6)于省吾：「王命，命傳，質一𣎵(檐)，飢之」，釋「𣎵」爲「檐」。其意爲「王之檐徒，凡任一檐者，所到的地方要供給饌食」。⁵³

(7)劉雨：「王命，命邇(專)質(任)，一檐飢之」。引中山王方壺「譟質」釋「邇質」爲「獨自擔當使命」，全句意爲「王發布命令，命持節者以獨自擔當的使命，所到處要供給一檐飲食」。⁵⁴

上述各家之意見，互有出入，各有得失，爭議焦點大約集中於「𣎵」字、「𣎵」字的解釋和全句的句讀三個問題。筆者認爲于省吾、張振林釋「𣎵」最精審，句讀應以「王命，命邇質，一𣎵飢之」最適洽，至於「邇質」一詞，則仍待更多的研究。以下筆者將評介各重要說法，並作補充。

關於「𣎵」字，從偏旁分析，應爲从𠂔从刀从辵，隸定爲邇，唐蘭認爲不从刀而从人，隸定爲「傳」，非是。古文字中「刀」字右筆明顯左斜，作「𠂔」，「人」字則右筆下行作「𠂔」，應有區別。《說文》九卷有剗字，从刀專聲，爲「斲」之或體。包山楚簡「𠂔」字數見，从刀𠂔聲，讀爲決斷之「斷」，⁵⁵ 信陽楚簡有「𠂔」字，从刀𠂔聲，讀爲「團」，⁵⁶ 此與包山簡之「𠂔」應爲一字，从刀从刀事類相近可通。長沙帛書有「𣎵」字(7.34)，結構與節銘「邇」字全同，讀爲「傳」。⁵⁷ 節文「邇」字應是从𠂔得聲之字。

「𣎵」字从木从𣎵，前人釋「𣎵」「𣎵」皆不可據，唐蘭已辯之甚詳。⁵⁸ 但唐蘭釋「𣎵」爲「檐」，讀爲「輶」，亦不可信。古文字中从「酉」之字都不

52 張振林：〈“檐徒”與“一𣎵飢之”新詮〉，《文物》1963年3期，頁48-49。

53 于省吾：〈鄂君啓節考釋〉，《考古》1963年8期，頁445-446。

54 劉雨：〈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133。

55 劉彬徽等：〈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收入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上册，頁373，註46。

56 同註54。

57 曾憲通：〈楚帛書文字編〉，收入饒宗頤、曾憲通編：《楚帛書》（香港：中華書局，1985），頁289「邇」字條。

58 同註47。

从「𠂔」，區別甚明。鄂君啓車節出土後，銘文中有「女（如）𠂔徒屯二十𠂔台（以）堂（當）一車」，「𠂔」字與節文同。殷滌非、羅長銘、郭沫若等仍以爲「𠂔」字，但以「𠂔」釋鄂君啓車節銘文實難通讀。⁵⁹ 于省吾與張振林不約而同釋「𠂔」爲「𠂔」，爲「檐」之初文，最有見地，其中尤以于氏之說最詳，其主要論據有四：（一）古文字从「音」之字作𠂔，與𠂔字不同。（二）晚周「言」字均作𠂔，例証極多。（三）𠂔即詹之初文，𠂔字孳乳从厂作詹，齊器國差簠「簠」字从「詹」，漢印「詹耳」之詹作「詹」可証。小篆孳乳作「詹」。（四）古文字中「音」「言」兩字無別，典籍中亦多例証。古韻音屬侵部，詹屬談部，侵談通諧。于氏論証甚詳，將車節「𠂔徒」釋爲「檐徒」，亦文從字順。⁶⁰ 釋「𠂔」爲「檐」，應可爲定論。

「𠂔」字，說者並無異見，但筆者認爲此字有關節銘通讀，故一並討論。字从食从人，《說文》「𠂔，糧也，从人食。」段注曰「以食食人物，其字本作食，俗作𠂔」。《玉篇》《廣韻》皆云「𠂔，食也」。《蒼頡解詁》「以食與人曰𠂔」。案：𠂔字結構應爲从人就食（與歛字結構相似），義與「食」同。金文習見𠂔鼎、𠂔匱、𠂔膚，皆爲食器或煮器，余義鐘「歛𠂔譟邁」，即「飲食歌舞」，「𠂔」義同「食」。包山楚簡遣策「食室」（簡251）亦作「𠂔室」（簡255），亦可知𠂔食爲一字。「𠂔」有以食食人物之義，《說文》艸部「茹，𠂔馬也」、竹部「簾，𠂔牛筐也」，知此義由來已久。

邁、檐、𠂔字之形義大抵敘述如上，然節銘「王命=邁賃一檐𠂔之」該如何釋讀和斷句，仍然難於確定。前引各家對節銘之斷句，一是「王命，命邁，賃一檐，𠂔之」，另一是「王命，命𠂔賃，一檐𠂔之」。兩說間尙存歧見。新出的包山簡147簡文對於節銘的句讀大有幫助。包山簡147簡文曰：

𠂔𠂔、宋獻爲王𠂔盥（？）於泯爰，屯二信之𠂔金銓二銓。𠂔（將）以成收。⁶¹

59 同註13、註20。

60 同註53。

61 釋文與斷句據〈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包山楚墓》頁360。

此簡意爲陳、宋二人爲王於某地做某事（「𩚑𩚑」可能是「煮鹽」，即「煮鹽」）⁶²，「屯二僮之飢，金銓二銓」，「飢」下應斷開，「屯」，全也，皆也，「屯二僮之飢」即「皆給予二僮之飲食」，另有「金銓二銓」（銓字義不詳）。簡文「僮」字所從「𩚑」與節銘「檐」字所从同，應讀爲「僮」。從簡文「二僮之飢」可確知節銘不應斷句爲「賃一檐，飢之」。

于省吾釋「𩚑」爲「檐」、「僮」之初文，今作「檐」或「担」，誠爲卓見，解釋鄂君啓車節「屯二十檐以當一車」，也極允洽。《漢書·貨殖傳》有「漿千僮」，顏注：「僮，人僮之也」，⁶³ 這是指通邑大都之物阜民豐，以「僮」爲計算糧食的單位。但在節銘中，「一檐飢之」及簡文「二僮之飢」，是給人以飲食，以「檐」計算，似有不妥。筆者認爲節銘中的「檐」字宜讀爲「甌」，《方言》五「甌，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僮」，⁶⁴ 郭璞注：「所謂家無僮石之餘也。音檐，字或作甌」。⁶⁵ 「甌」是甌或大甌（見《埤蒼》）。〈貨殖傳〉「漿千僮」下，孟康注云「僮，甌也」。「甌」是一種盛漿食的器具，以之讀節銘似更順暢。

確定「王命，命邇賃，一檐飢之」的斷句及「一檐飢之」的意義後，前述各家以「賃一檐」爲釋者，就都不能成立了，「賃」字應屬上讀，「命邇賃」是不能再割裂的單位。節銘中的第一個「命」字是名詞，重文符代替的「命」字是動詞，唐蘭此說誠是。但「邇賃」一詞該如何解釋？仍極費思量。

前引流火、張振林將「邇賃」直接釋爲「官名」、「地方官吏」，似有不妥，即使是作官名，「邇賃」二字也應是有意義的。劉雨根據中山王方壺「譟賃」一

62 「煮鹽」說見劉釗：〈包山楚簡文字考釋〉，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抽印本，第114條。

63 《漢書》卷九十一〈貨殖傳〉，頁3687-3688。

64 周祖謨：《方言校箋》（台北：鼎文書局，1972），頁34。周氏校箋曰「僮，《御覽》卷七五八及《爾雅釋器》疏引同。《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甌』。戴本據改。」

65 同上，周氏《校箋》曰「《後漢書》注引作“所謂家無甌石之儲者也”，戴本據改。案：“家無僮石之儲”見《漢書·楊雄傳》」。

詞，釋「邇賃」爲「專任」，是比較特別的意見，值得一提，筆者在此略作介紹及討論。中山王器銘文中，中山王盛讚相邦賈之賢德，對賈十分信賴，將國家重任交付予賈：

余智（知）其忠諫（信）崐（也）而譟賃之邦。（方壺）

是以寡人匱（委）賃之邦而去之遊。（大鼎）⁶⁶

或旻（得）賈（賢）狝（佐）司馬賈而冢（重）番（賃）之邦。（圓壺）⁶⁷

銘文中「譟賃之邦」「匱賃之邦」「冢賃之邦」句法相同，主語爲中山王，「之」爲代詞，指相邦賈。「匱賃」、「冢賃」意與「譟賃」相同，皆專付責任，重加責任之義，即委託相邦賈以國家之事。與「譟賃」類同的例子如《漢書·蕭何傳》「上以此剽屬任何以關中事」，指漢王將關中事「剽屬任」於蕭何，顏注「剽，讀與專同」。⁶⁸類似的例子尚有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蘇代自齊獻書燕王章〉「王者欲剽舍臣而博任所善」，⁶⁹《戰國策·燕策二》作「剽任所善」，⁷⁰《淮南子·汜論訓》「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⁷¹《戰國策·燕策一·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章》「於是燕王專任子之」⁷²等。這些例子在「專任」下都接所任之人。

若節銘「命譟賃」讀爲「命專任」，則「王命，命譟賃」應爲「王命，命（某人）專任（某事）」的節縮語，省略了人與任務，強調的是持節者爲王所專任之人。這個說法有其不足之處，前引各例的主語皆是「王」，而以「專任」爲主要動詞，後接賓語（所專任之人），文獻中似未見與「命專任」相似之語例。

66 匱賃，徐中舒、伍士謙據《汗簡》「魏」字作「匱」，釋爲「委」，見〈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堂圖說明〉，《中國史研究》1979年4期，頁90，註20。

67 「冢」讀爲「重」，見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1期，頁50，註4；頁51，註21。

68 《漢書》卷三十九〈蕭何傳〉，頁207。

69 《馬王堆漢墓帛書》（參）〈戰國縱橫家書〉，簡48，〈釋文〉頁48。

70 《戰國策》卷三十〈燕策·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頁1095。

71 《淮南子》（四部叢刊初編本）卷十三〈汜論訓〉「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頁7。

72 《戰國策》卷二十九，頁1062；又見於《史記·蘇秦列傳》卷六十九，頁2268。

再者，節銘「邇」字从辵，而燕物鷹、雁、馬節銘文（詳後）也有「逌」字，同樣出現在與傳遞相關的節銘上，其與「傳遽」之「傳」的關係，恐亦不可忽略。

唐蘭〈王命傳考〉文中雖對龍節銘文斷句有誤，釋「檣」爲「輶」也不足取，但釋「邇」爲傳遽之「傳」，仍值得重視。「邇賃」或可釋爲「傳遽之賃」，「王命，命邇賃，一檣飢之」指王命令傳遽之賃者，供給持節者以飲食。

總之，龍節銘文「王命，命邇賃」一語，目前尚未有很恰當的解釋，這可能由於銘文節縮太甚之故，有待作進一步的研究。但王命傳遽與持節者配合，提供住宿飲食，這一點應是可以確定的。至於持節者之姓名及操持、所適等，應是另書於「傳」上，這正合於《周禮·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的記載。由此我們可以推測此「王命=邇賃」節是不特定爲某人某事鑄造，而是多量製成之後以便王隨時取用，這與鄂君啓節之爲鄂君舟車通關免稅特鑄金節，性質不同。

通過以上的討論，可知此「王命=邇賃」爲王發給持節者，以便交予傳舍提供飲食。傳舍中人對於「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墨子·號令》），「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漢書·王莽傳》）。⁷³

關於由驛傳供給飲食的規定，《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中留下了詳細的資料：

御史卒人使者，食稗米半斗，醬駟分升一，采羹，給之韭蔥。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從者，食糲米半斗；僕少半斗。（〈傳食律〉179-180簡）

不更以下到謀人，稗米一斗，醬半升，采羹，芻藁各半石。宦奄如不更。（〈傳食律〉181簡）

上造以下到官佐、史無爵者，及卜、史、司御、寺、府，糲米一斗，有采羹，鹽廿二分升二。（〈傳食律〉182簡）⁷⁴

73 《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頁4122。

74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釋文註釋》，頁60-61。1983年江陵張家山西漢初墓出土竹簡中有〈律令二十六種〉，其中亦有傳食律，可惜這批資料尚未見發表。

〈秦律十八種·倉律〉中也規定：到軍中和屬縣辦事，應自帶口糧，「毋以傳資縣」，已經按月領有口糧的人員「而公使有傳食」，到月底沒回來，就必需停發月食。⁷⁵ 鄂君啓車節、舟節的銘文最後是：

𠂔（得）其金節則毋政（征），毋舍𠂔𠂔。不𠂔（得）其金節則政（征）。朱德熙、李家浩將「𠂔𠂔」釋為「樽食」，讀為「傳食」，⁷⁶ 即見到金節就不要征稅，但不必由傳舍供給飲食，不見金節就要課稅。由於鄂君啓的府商是私人商團，非國家官吏，金節只能免稅，官方設置的傳舍不必提供飲食。⁷⁷

「王命 = 遡賃」節是由王頒的通行憑証，應該可以確定，但是否一定就是《周禮》中所謂的「龍節」，則無法証明，僅以此節上有龍首飾就肯定其為行使澤國用的龍節，恐言之過早。但筆者也不贊成唐蘭將此物名為「傳」。⁷⁸ 原因有二：（一）節銘中固有「遡」字，但與「賃」字合為一詞，並不在「遡」下斷句，以「王命，命傳」句讀不當，前面已經討論過。（二）《周禮·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云：「節為信耳，傳，說所齎操及所適」，可見「傳」是配合節信而書寫了攜帶物品、前往地點，也可能包括了持節者的姓名等。「王命 = 遡賃」節上並未書明上述細節，可明証其非「傳」，也更可說明其為「節」的性質，另外再有以竹木書寫細節的「傳」以輔之。

儘管唐蘭釋「王命 = 遡賃」節為「傳」不妥，對於銘文釋讀、句讀都不盡確實，但是唐氏在文中對於中國古代傳遽制度的討論仍是非常豐富、詳盡，很值得參考。

歷代的著錄中還有兩件鷹節（《三代》18.31.7；18.32.1），雁節（《三代》18.31.6）（見附圖六），銘文中皆有「遡」字，「遡」字下有𠂔字，朱德熙、裘錫圭認為𠂔是从𠂔从異省，即「虞」字，當讀為傳遽之「遽」，又在註中

75 〈倉律〉45-46簡。同上書，頁31。

76 朱德熙、李家浩：〈鄂君啓節考釋（八篇）〉，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68-69。

77 傳舍中的飲食有專人管理，于省吾：《雙劍謠古器物圖錄》（北京：大業印刷局，1940）下.14著錄的「𠂔𠂔之鉉」可能就是管「傳食」之官所用的璽印。

78 唐蘭：〈王命傳考〉，頁69。

認為即使把「𨔵」字分析為从乘𨔵聲，也可以讀作「虞」，⁷⁹ 並結合「𨔵皇」印文，討論了古代遽駟制度，很值得參考。筆者認為鷹節、雁節中的「𨔵」字上从𨔵，𨔵寫作𨔵，常見於燕國兵器、璽印、明刀背文，是燕地特有的寫法，⁸⁰ 字下从「𨔵」，為「乘」字之訛省，从𠂔（大字）从雙足，璽印中屢見複姓「公乘」作𨔵𨔵，中山王石刻作𨔵𨔵，楚鄂君啓車節「車五十乘」的「乘」作「𨔵」，望山二號墓簡和包山楚簡輅字作「𨔵」，節銘中的𨔵應是「乘」字比較簡率的寫法。⁸¹ 「𨔵」字从乘𨔵聲，「連虞」讀為「傳遽」。鷹節、雁節宜是戰國燕地與驛傳制有關的符節。《三代》18.31.3另著錄有「騎漣侯馬節」（見附圖六），雖不詳其所屬地域，但與傳遽有關，亦可確定。

《三代》18.31.4另錄有熊節，銘為「𨔵一𨔵」，《三代》18.31.5有馬節，銘為「齊節夫=□五𨔵」（見附圖七），唐蘭指出「𨔵」為「乘」字，「一乘」「五乘」是為發傳車，⁸² 其說可信。《貞松堂集古遺文》11.12錄有虎形符節，⁸³ 僅有左半，有錯金銘文六字，其中五字在兩片中分對剖處，字不詳（見附圖七）。左脅有「𨔵」，應同熊節、馬節，亦為發傳車之用。「𨔵」字為戰國齊地的特殊寫法，臨淄出土齊陶「乘」字作𨔵、𨔵。⁸⁴ 上述熊節、馬節、虎節可能都是戰國齊地之物。

《史記·孝文本紀》「餘皆以給傳置」下，〈索隱〉案：「《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

79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年1期，頁88。

80 燕下都23號遺址107號戈有「𨔵」字（〈燕下都第23號遺址出土一批銅戈〉，《文物》1982年8期，頁44，圖3）；羅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2747有「𨔵」，為甌字，3057「𨔵」，為盧字。商承祚：《先秦貨幣文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頁180-182有𨔵（盧）字。有關燕系文字「𨔵」形的寫法，可參考湯余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986），頁50-54。

81 「乘」字甲骨文作𨔵，象人乘木之形。金文中有人下加雙足者，如𨔵（格伯簋），「大」（即人形）到戰國常寫作𠂔，則古璽中𨔵字應為𨔵的變形，即「乘」的省文。

82 唐蘭：《王命傳考》，頁71-72。

83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庚午刊本）卷十一，頁12。

84 高明：《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3.606；3.492。

置，四馬中足爲馳置，四馬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輶置，如置急者乘一馬曰乘也。」⁸⁵ 這兒看出在漢代對於傳馬的數量和品相都有詳細的規定，傳馬數量多寡也代表乘者的身份地位。高級傳車以四馬爲習，次級輶車以一、二馬爲習，⁸⁶ 特急者乘馬。⁸⁷ 《史》《漢》中記有乘四乘傳以上者，皆特殊地位或事故。⁸⁸ 前述馬節錯金銘曰「齊節夫 = □五乘」，可能也是比較特殊的情況。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中對於傳馬（駕傳車之馬）餵食有詳細的規定。⁸⁹

戰國秦漢間之傳駟情況，從相關文獻資料來看，已有相當完備的制度與規模。⁹⁰ 本節中所述「王命 = 遡賃」節，銘文就指明是「王命」，要由傳舍供給飲食，鷹雁熊馬諸動物形符節，雖無「王命」字樣，但亦爲通行憑証之用（馬節自名爲「齊節」可証），且要求驛站提供「傳車」，這些器物都爲傳遽制度提供了具體的實物証据。⁹¹ 「王命 = 遡賃」節，或上述這些動物符節，與一般「以木爲之」的「傳」應有所不同，節以銅質鑄造，甚或錯金文字，皆是因作節信之用，特爲慎重之故，而一般商賈百姓之通關憑証，需書以操持者姓名及前往地點等相關資料，必以竹木爲之，經官府封信，亦可用作信物，漢律中規定甚明。⁹²

85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頁68。

86 居延漢簡中屢見「輶車一乘，用馬一匹」、「輶車一乘，馬二匹」。見《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25.2；505.9；36.6等。

87 《漢書·高帝紀》（五年田橫）「乘傳詣洛陽」下，如淳引律曰「急者乘一乘傳」，與《史記》略有不同。

88 《史記·呂太后本紀》謂代王「乘六乘傳」，《漢書·爰盎傳》也說「從代乘六乘傳」，《史記·吳王濞傳》謂條侯代皇帝出征時「乘六乘傳」，這些都合天子駕六馬之規定。《漢書·武五子傳》謂昭帝死無嗣，霍光以璽書召劉賀典喪，爲求快速，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

89 〈秦律十八種·倉律〉47簡。

90 除了唐蘭〈王命傳考〉和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遽駟考〉之外，尚有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駟傳制度〉，《吉林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年2期，頁78-114；樓祖詒：〈漢簡郵驛資料釋例〉，《文史》第三輯（1963），頁123-144；高敏：〈秦漢郵傳制度考略〉，《歷史研究》1985年3期，頁69-85，皆可供參考。

91 高敏文利用文獻資料及秦漢簡牘資料，論述翔實，但未引用本文所討論的「王命 = 遡賃」節及諸動物形符節。

92 《漢書·平帝紀》「在所爲駕一封輶傳」，如淳注「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

四、戰國至秦的兵符

目前可見的戰國與秦的兵符，都做虎形。歷史上最著名的兵符，大概要屬魏公子無忌請如姬從王臥內所盜的兵符，也是虎形。《說文》有「琥」字，許慎曰：「琥，發兵瑞玉，爲虎文，从玉从虎，虎亦聲。春秋傳曰：賜子家雙琥」。許慎是以漢代發兵虎符說「琥」字，與《周禮·大宗伯》所載「白琥禮西方」的「琥」不同。

本節中要討論的有戰國楚「王命＝車駟」虎節、秦杜虎符、新郢虎符，秦統一天下後的陽陵虎符，並及疑偽的秦東郡虎符及秦甲兵虎符、秦王命虎節。

（一）「王命＝車駟」虎節

「王命＝車駟」虎節，1983年出自廣州象崗西漢南越王墓。全器鑄成一平版伏虎形，姿態生動，器長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虎的斑紋以柳葉形金箔爲飾，虎眼、虎耳皆以細金片勾勒，製作極其精美。虎節正面有錯金銘文「王命＝車駟」五字（含重文符）（見附圖八）。⁹³

在過去的著錄中，與「王命＝車駟」虎節同爲平版伏虎形的符節有兩件，一是前面談過的《尊古齋所見吉金圖》4.47著錄的「王命＝遡賃」虎節，另一是《商周金文錄遺》537所著錄的「王命□□」節，⁹⁴其中尤以《尊古齋》所錄出自壽縣楚墓的「王命＝遡賃」虎節，作伏虎弓身捲尾露齒之造型，和西漢南越王墓出的「王命＝車駟」虎節幾乎完全相同，所差者僅銘文和錯金文字及金箔飾而已。原發掘報告《西漢南越王墓》很保守的認爲「是南越王國仿楚器鑄制，但

93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西漢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87。

94 《商周金文錄遺》537著錄銅質虎形符節，銘文前二字爲「王命」，「命」下是否有重文符，不詳，後二字拓片不清，其中前一字應爲「遡」，但最後一字作𠂔，非「賃」字。孫稚維《金文著錄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407，及嚴一萍《金文總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84），頁4590，逕名爲「王命＝遡賃」節，不妥。

不排除原屬楚器因故流入嶺南者」，⁹⁵ 筆者認為此器從造型及銘文字體兩方面看，皆宜為戰國楚物，從其出土時通體裹有絲絹看來，此虎節因製作精美而被珍藏並為陪葬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⁹⁶

虎節銘文「王命=車𨔵」中，唯有「𨔵」（𨔵）字需加討論，原發掘報告據劉雨之說釋為𨔵，又據饒宗頤之說隸定為𨔵，⁹⁷ 讀為「徒」。筆者茲據包山楚簡資料作補充說明。馬字在西周金文及秦文字中多寫作𨔵，畫出完整的馬頭、馬鬃、馬身側面雙足及馬尾。戰國東土文字率簡作𨔵，只留馬頭及馬鬃，而以下「𨔵」代表省簡的馬身及足尾。在包山楚簡中，馬字單寫常作𨔵，如𨔵（包山簡114）、𨔵（包山簡133）、𨔵（包山簡240），从馬旁之字則多寫作𨔵，仍畫出馬身側面雙足，而略去馬尾，如駁字作𨔵（包山簡180），駝字作𨔵（包山簡187）。虎節銘𨔵字从𨔵从𡗗，𨔵是包山簡中𨔵字整齊化的寫法，⁹⁸ 非如饒氏所說从且从又。右旁𡗗字為六國「土」字，《說文》「社」字从示土，古文作𡗗；中山王圓壺「于彼新土」之「土」作「𡗗」可証。節銘𨔵字可隸定為「𨔵」，「王命=車𨔵」應讀為「王命，命車徒」。西周穆王時器班簋銘「王令毛公曰邦冢君、土馭、戡人伐東國瘠戎」，「土馭」之「土」亦讀為「徒」。「車徒」聯言，典籍習見，是指兵車與步卒。

南越王墓「王命，命車徒」虎節，應為兵符性質，是為徵調或為發兵，不能確知。從銘文來看，其文義似有未盡，是否如「王命=遡質」節，另有一片，補足文義，不知其詳，但其為戰國楚兵符，應可確定。

95 同註93，頁316。

96 同一墓葬中出土之兵器皆鐵器，唯一「王四年相邦口義」銅戈，為典型的秦式兵器，其鑄造年代可能為秦惠文王後元四年（321 B.C.）。此秦式銅戈出土於西漢南越王墓中，亦可能是墓主珍藏而為陪葬品者。

97 劉雨、饒宗頤說見於《西漢南越王墓》，頁315。同頁註2說明饒氏意見是據饒宗頤《南越文王墓虎節考釋》手稿。筆者未見饒氏原文。

98 包山楚簡有「𨔵」字五見，簡12和126「大𨔵尹市」可能是官職名稱，簡73「不量𨔵奉」、簡132反「𨔵尹作𨔵從𨔵以此等𨔵」、簡157「𨔵𨔵𨔵」，其義不詳。

（二）秦杜虎符

杜虎符是 1974 年冬在西安市郊區北沈家橋村東北 0.5 公里處出土；拾獲者是個中學生，在協助公社平整土地時拾得此物，拿回家給妹妹當玩具，摩挲日久，綠鏽脫落，露出閃閃金字，才意識到是件歷史文物，特於 1978 年 11 月 30 日交獻給陝西省博物館（見附圖九）。⁹⁹ 虎符僅存左符，身長 9.5 厘米，高 4.4 厘米，厚 0.7 厘米。虎作立走形，昂首，尾端捲曲。符陰有槽，作合符之用，頸上有一小孔，身上有錯金銘文四十字，從虎頸自左向右，由背部向腹部書寫，銘文曰：

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雖毋會符，行毆。¹⁰⁰

杜符經報導後，青銅器辨偽專家羅福頤指出杜虎符全據新鄴虎符偽造，措辭強烈，指作偽者「行偽而堅，言偽而辯」。¹⁰¹ 關於杜虎符的真偽問題，已有戴應新（徵集者）及陳尊祥（查看出土及訪談交獻人）為文作了清楚的交待，¹⁰² 請參考。

杜虎符出土的北沈家橋村正處先秦杜縣中心地帶，村東南一公里處張堡村附近曾出土一紅色夾沙陶釜，蓋上有「杜市」戳記，釜中裝有先秦半兩錢一千枚。出土地東南一公里正是下杜城，周時的杜伯國，秦武公十一年初設杜縣。杜虎符銘文稱「左在杜」，與其出土地的地理位置正合。¹⁰³

關於杜虎符的年代，最早發表意見的是陳直。¹⁰⁴ 陳氏認為符文「右在君」的「君」是指始皇弟長安君成蟜而言，並引《史記·秦本紀》（八年）「王弟長

99 關於杜虎符出土及徵集經過，各報導間有異同。此處採用陳尊祥：〈杜虎符真偽考辨〉（《文博》1985 年 6 期，頁 25-29）之說法。陳氏曾多次赴出土地察看並訪談相關人員及調閱徵集記錄等，其說應該最為可信。

100 黑光：〈西安市郊發現秦國杜虎符〉，《文物》1979 年第 9 期，頁 93-94，圖版 8。

101 羅福頤：《商周秦漢青銅器辨偽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81），頁 49-51。

102 戴應新：〈秦杜虎符的真偽及其有關問題〉，《考古》1983 年 11 期，頁 1012-1013；陳尊祥：〈杜虎符真偽考辨〉，頁 25-29。

103 參陳尊祥文，頁 26-27。

104 陳直：〈秦兵甲之符考〉，《西北大學學報》1979 年 1 期，頁 72。

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云云，指杜虎符為始皇八年以前之物，與新鄴符時代略相當。陳氏此說實不堪推敲，兵符中的右符依例當在君王手中，未聞皇弟或將軍握有右符，長安君將軍擊趙，若握有軍符，應為左符，杜符銘文「右在君，左在杜」，明言左符給了杜地將領，非長安君甚明。陳直之後的研究者對於杜虎符的年代，有兩種意見，其一是以符銘「右在君」訂其年代，秦惠文君十三年稱王，十四年初更元年，杜符的年代是在秦惠文稱君的十三年間，即 337-325 B.C.。¹⁰⁵ 第二種意見是認為杜虎符銘文與詔版相似，形製與新鄴符相近，年代亦應接近，約在秦統一前十年間。¹⁰⁶

上述二種意見中，筆者贊同前說。杜符銘文曰「右在君」，按之《史記》，〈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其下曰「惠文君元年」，〈六國年表〉「（惠文君）十三年四月戊午，君為王」，「十四年初更元年」。〈周本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此事又載於〈楚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張儀列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¹⁰⁷ 從這些資料可確知惠文稱「君」時在公元前 337 年到 325 年四月，第二年（324 B.C.）更元。杜符稱「右在君」，新鄴符稱「右在王」、陽陵符稱「右在皇帝」，一字之差，反映了各符的鑄造年代。¹⁰⁸ 如果將杜符的年代視與新鄴符年代相同，很難對此一字之差有合理的解釋。¹⁰⁹

105 馬非百：〈關於秦國杜虎符的鑄造年代〉，《文物》1982 年 11 月，頁 85；胡順利：〈關於秦國杜虎符的鑄造年代〉，《文物》1983 年 8 月，頁 88；朱捷元：〈秦國杜虎符小議〉，《西北大學學報》1983 年 1 期，頁 53-55；陳尊祥，同註 99；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頁 37-40。

106 戴應新，同註 102；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184。

107 《史記》卷五〈秦本紀〉，頁 205；卷十五〈六國年表〉，頁 730；卷四〈周本紀〉，頁 160；卷四十〈楚世家〉，頁 1721；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頁 1984-1985；卷七十〈張儀列傳〉，頁 2284。

108 最早指出此一字之差反映鑄造年代的是馬非百，詳馬非百：〈關於秦國杜虎符的鑄造年代〉。

109 戴應新認為稱「君」稱「王」可互通。筆者認為在「君」與「臣」對言時，君指在王位者，但君主自稱君、王或皇帝時，有其特別之政治意義，不能認為是稱謂互通。否則惠文君何必於十三年四月「稱王」？戰國時期，各國紛紛稱「王」，這與周室

從銘文字體看，王輝提出以秦惠文君時的典型銘刻秦封宗邑瓦書銘文作對比，是極有見地的。瓦書作成於秦惠文君四年（334 B.C.），銘文中有吏（事，使字偏旁）、之、杜、在（𠂔）、以（𠂔）、右、乃、左（佐字偏旁），可與杜符銘文對照，其中只有「在」字、「以」字寫法有些差異，其餘各字大體相同（「在」「以」兩字在秦漢之交仍未定型）。如果拿詛楚文（312 B.C.）字體與杜符銘文相比，如敢、毆、興等字，也極相近。換句話說：在公元前第四世紀後半，秦文字中，上舉這些字例（「在」「以」除外）基本上已無太大出入，沿用至秦統一時，亦無大改變。新鄴符之文字與杜符沒有很多差異，原因同此。戴應新認為杜符文字與詔版近，製成年代亦相近，筆者則認為：文字用於衆人之手，每一種字體，都必需經過長時間的演變，才能逐漸定型，每一個字定型的早晚亦都不同。杜符、新鄴符與詔版部份字的結構形體相近，應該說是篆體逐漸定型的必然結果，不能據此訂出杜符與詔版時代相近的結論。從個別字例上看，也有仍在變動中不穩定的例子，例如「以」字，石鼓作𠂔、瓦書作𠂔、詛楚文作𠂔、虎符皆作𠂔、繹山碑作𠂔、睡虎地簡、放馬灘簡作𠂔，《說文》小篆作𠂔，這是個定型得晚的例子。若僅由杜虎符和新鄴符比較，新鄴符有較杜符規整化的字例，如「被」字所从的「皮」旁，杜符作𠂔，新鄴符作𠂔，而石鼓作𠂔，《說文》籀文作𠂔、篆文作𠂔，從這個字例可以看出杜符與石鼓近，《說文》籀文近石鼓而略有訛變，《說文》篆文則近新鄴符而略有訛變。我們不能因杜符銘文中部份字與詔版相似，就定兩者年代相近，而必須把握秦文字在演變過程中的「變」（不穩定）和「不變」（一脈相承），兩面兼顧。

杜虎符的銘文與其約略同時的秦封宗邑瓦書近似，與其稍後的詛楚文亦無太大差異，個別字例看來較新鄴符為早，大體與新鄴符同則是篆體逐漸定型的結果。筆者認為，把杜虎符的製造年代放在惠文稱君的年代（337-325 B.C.）是比較恰當的。

名存實亡有關，史書上對於各國稱王之事詳加記載，也絕非毫無意義。秦惠文君既已稱王，不太可能在歷經武王、昭王、莊襄王之後，到了秦王政時期，又回頭自稱君。

（三）新鄭虎符

新鄭虎符最早見於著錄是在羅振玉編《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26（1925年出版），刊載虎符之白描圖形及摹寫銘文。其後在容庚《秦漢金文錄》1.41（1931年出版）著錄羅福頤所作仿本，四虎連排，表現出虎圓雕和金屬反光效果及搨本意味的銘文。¹¹⁰ 另一種仿刻本出現在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中（1935年出版），此圖是將銘文及虎形仿刻於石上再作拓本，上鈐有「羅福頤手摹金石文字」印，知此拓本亦出自羅福頤之手（見附圖十一）。¹¹¹

新鄭虎符之收藏，據王國維《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謂藏於「日本某氏」，¹¹² 其後就一直下落不明，直到1973年冬才出現在巴黎一項中國古藝術品拍賣會上，後歸巴黎陳氏收藏。侯錦郎因而有機會詳細觀察並作深入討論，發表〈新鄭虎符的再現及其在先秦軍事、雕塑及書法研究上的重要性〉，同時刊載新鄭虎符的彩色照片、銘文放大照片（見附圖十），對於此符形態及銘文的存真和流傳，極有助益。¹¹³

新鄭虎符僅存左半，根據侯錦郎的敘述，原器為模鑄，作伏虎形，前後腳平蹲、虎頭前伸、耳上豎、尾上捲，由鼻尖自尾彎處長8.8厘米；前腳至耳尖高3.2厘米；後腳至背高2.2厘米；淨重95公克。銘文共四十字，分四行，自虎頸順著虎背向尾部書寫，錯金文字，從侯文所附銘文放大照片看來，羅福頤的摹本太過圓潤，失去原本刀筆方折之痕跡。在侯文之前，對新鄭符的研究，唯王國維〈秦新鄭虎符跋〉一文最具卓見，全文僅三百餘字，言簡意賅，茲轉錄如下（相關地名的位置，請參見附圖十六）：

新鄭虎符文四行，錯金書，云：「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鄭，凡興士

110 容庚：《秦漢金文錄》（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卷一，頁41。

111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增訂本），第五冊，頁292下。

112 王國維著，羅福頤校補：《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北平：墨緣堂，1933），卷七，頁1。

113 侯錦郎：〈新鄭虎符的再現及其在先秦軍事、雕塑及書法研究上的重要性〉，《故宮季刊》10卷1期（1975），頁35-77，圖版1-5（以下簡稱〈新鄭虎符的再現〉）。

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雖無會符，行毆。」羅叔言參事得其影本，臨以寄余。其文甲作𠄎，兵作𠄎，在作十，與秦陽陵符同；凡作𠄎，與散氏盤同；敢作𠄎，也作毆，與詛楚文同，餘字皆同小篆。余謂此秦符也。

新鄴本魏地，〈魏策〉蘇秦說魏王「大王之國，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鄴」。至安釐王時，尚爲魏有，《史記·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原註：秦昭王四十一年）「秦拔我鄴丘」，應劭以爲即「新鄴」。然「鄴丘」，〈秦本紀〉作「刑丘」，〈六國表〉作「廩丘」，〈秦本紀〉言是年「攻魏，取邢丘、懷」，邢丘與懷二地相接，自當以邢丘爲長。其後公子無忌說魏王云「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是彼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新鄴在舞陽之東，其中間又隔以楚之陳邑，時楚正都陳，秦不能越魏、楚地而東取新鄴明矣。至昭王五十四年，楚徙鉅陽，始皇五年，又徙壽春，新鄴入秦，當在此前後。然則此符當爲秦併天下前二三十年間物也。¹¹⁴

王氏從文字上確定新鄴符爲秦符，誠爲不易之論。至於新鄴符的年代，除了王國維謂「秦併天下前二三十年物」之外，尚有唐蘭認爲「在秦始皇十七年滅韓置潁川郡之後，廿六年稱皇帝之前」，¹¹⁵ 侯錦郎、朱捷元則根據《史記·魏世家》載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鄴丘」訂新鄴符之製造上限爲此年，即 266 B.C.。¹¹⁶

新鄴虎符的年代，下限應在秦統一天下、始皇稱「皇帝」之前，這從新鄴符稱「右在王」而陽陵符稱「右在皇帝」有別，可以確定。至於其製造年代之上限，因牽涉到史籍對秦昭王四十一年攻魏事件記載不同而有爭議。案：据《史記》所記，昭王四十一年，即魏安釐王九年，秦魏間僅有一件戰事，《史記·秦本紀》

114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八，收入《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二冊，頁 891。

115 唐蘭：〈懷鉛隨錄·新鄴虎符作於秦王政十七年滅韓後〉，《申報》1948 年 6 月 26 日〈文史〉版。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據原開明書店 1949 年 3 月版重印），頁 165。

116 侯錦郎：〈新鄴虎符的再現〉，頁 58-59。朱捷元：〈秦國杜虎符小議〉，頁 55。

曰「攻魏取邢丘」，¹¹⁷ 〈魏世家〉「秦拔我鄴丘」，¹¹⁸ 同一件亦載於〈六國年表〉曰「秦拔我廩丘」，¹¹⁹ 〈范雎列傳〉載「拔邢丘」。¹²⁰ 《戰國策》記此事謂「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¹²¹ 這一段異文，歷來做《史記》考証者，都各有意見，看法不一。¹²²

究竟秦昭王四十一年攻下的是邢丘？廩丘？或鄴丘？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墓出土的秦簡〈編年紀〉明確提供了答案。〈編年紀〉逐年記述秦昭王元年（306 B.C.）至始皇三十年（217 B.C.）間秦統一全國的戰爭過程，其中簡39-41文字如下：

卅九年攻懷（簡39）

卅年（簡40）

卅一年攻邢丘（簡41）¹²³

秦簡〈編年紀〉這條資料，指明昭王四十一年攻打的是「邢丘」，解決了《史記》「秦拔我鄴丘」異文的爭議，對新鄴虎符年代的討論極為重要。學者根據〈魏世家〉的資料而訂新鄴陷秦於昭王四十一年（266 B.C.），並以此為新鄴符製造年代之上限，其誤甚明，據此而論新鄴戰略地位，亦不免落空。¹²⁴

唐蘭認為新鄴符作於秦始皇十七年（230 B.C.）滅韓置潁川郡以後，始皇二十六年（221 B.C.）稱帝之前，其主要論據是：（一）《戰國策·魏策》將許、鄢、昆陽、舞陽與新鄴並列，前四地皆在潁川郡，則新鄴亦應在潁川郡，始皇十

117 《史記》卷十五〈秦本紀〉，頁213。

118 《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頁1854。

119 《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頁744-745。

120 《史記》卷七十九〈范雎蔡澤列傳〉，頁2410。

121 《戰國策》卷五〈范雎至秦〉，頁191。

122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宏業書局，1980）卷四十四〈魏世家〉，頁702「秦拔我鄴丘」條下引洪頤語曰「當作『邢丘』為是」。梁玉繩《史記志疑》（《廣雅書局叢書》152冊）卷四〈秦本紀〉，頁38認為當依〈魏世家〉作「鄴丘」。王叔岷《史記斟證》（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3），〈魏世家〉頁1663「十一年秦拔我鄴丘」條同意梁玉繩之說。

123 《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頁6，釋文頁5。

124 侯錦郎：〈新鄴虎符的再現〉，頁58-62。

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新鄴入秦，宜在此時，漢高祖置汝南郡，新鄴由潁川劃屬汝南。（二）新鄴符文字爲小篆體，而小篆體爲李斯手創，潁川置郡時，李斯已用事。¹²⁵ 唐蘭之說影響甚大，不少學者肯定其說。細加推究，卻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從新鄴的地理沿革而言，唐蘭所引〈魏策〉原文是：「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壑，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西有…；北有…；壑方千里』。」《史記·蘇秦列傳》所記略同。¹²⁶ 這一段話只能說明在魏襄王（318-296 B.C.）時，新鄴屬魏，地在魏國的南面，並不能得出新鄴（在安徽北部）與許、鄢、昆陽、舞陽（河南中部）並屬潁川郡的結論。何況到了西元前三世紀後半，河南、安徽一帶戰況最烈，魏公子無忌說魏王不要親秦攻韓時，昆陽屬秦、許屬韓、舞陽屬魏，¹²⁷ 情勢已與蘇子說魏王時不同。新鄴位在舞陽之東，介於魏楚之間，究竟誰屬，何時入秦，文獻資料無徵。¹²⁸ 秦滅韓所置潁川郡，位在河南中部，與新鄴入秦，並無必然關係。其次，從秦文字發展的角度來看，小篆體的發展是漸進的，到戰國中晚期，如杜虎符、詛楚文等文字資料已足以說明小篆體的完成，不待李斯而後定，唐蘭將新鄴符的篆體銘文與潁川置郡、李斯用事並談，似有未當。

王國維〈秦新鄴虎符跋〉引魏公子無忌說魏王曰「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一語，指出「彼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新鄴在舞陽之東，中間又隔以楚之陳邑，時楚正都陳，秦不能越魏、楚地而東取新鄴明矣」，王國維的推論應是以「不可能越國攻城」爲根據。關於戰國時期「越國攻城」的可能性，這個問題

125 同註 115。

126 《戰國策》卷二十二〈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頁 787；《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頁 2253。

127 詳見《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頁 1857-1859；《戰國策》卷二十四〈魏策·魏將與秦攻韓〉，頁 869-874。魏無忌說魏王不要親秦攻韓，其中提及宣太后死、穰侯出等事，知其年代不能早於昭王 41 年（266 B.C.），宜在昭王 41 年稍後。

128 新鄴在漢代屬汝南郡，《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頁 1562「新鄴」下，應劭注曰「秦伐魏，取鄴丘，漢興爲新鄴」，據此則秦自魏奪新鄴，與滅韓置潁川郡無關。

可能要交給軍事史家去解決。不過我們也可以再檢視王國維所引用的「無忌說魏王」這段資料，並加思考：

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乎？¹²⁹

此事在公元前 266 年稍後，秦已有潁川地區的葉陽、昆陽，如果想要攻打東方的許地（此時屬韓），可以繞道魏國的舞陽之北，南國（指韓國，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必危，魏國也不能無害。可見魏國的舞陽並不足以構成秦國東進的妨礙，楚之陳邑是否構成秦攻新鄴的阻隔，也可思過半矣。

總括上述，新鄴在魏襄王時代（318-296 B.C.）本為魏地，到戰國晚期，新鄴地處魏楚之間，何時入秦，文獻無徵。王國維謂楚於秦昭王五十四年（253 B.C.）自陳徙鉅陽，始皇六年（241 B.C.）再徙壽春，「新鄴入秦，當在此前後」，此可備一說。魏亡於 225 B.C.，楚亡於 223 B.C.，新鄴此時可確定入於秦之版圖。筆者雖然認為王國維、唐蘭討論新鄴符的理由皆非「必然」，但並不反對王國維「此符當為秦併天下前二、三十年間物也」的結論，也不反對唐蘭認為此符「當為秦統一前十年間物」，楚徙鉅陽、再徙壽春，秦滅韓置潁川，都有利於秦國長驅直入今安徽地區。總之，新鄴的年代宜在戰國末期至秦統一天下（221 B.C.）之間，其製造年代的上限無法具體確知。至於「秦拔我鄴丘」一語，已由睡虎地簡〈編年紀〉證明為「邢丘」之誤，據此斷定新鄴符製造年代上限為 266 B.C. 的說法，必須放棄。

（四）陽陵虎符

陽陵虎符曾由羅振玉私藏，現歸中國歷史博物館，《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3 著錄其白描圖形及摹寫銘文（見附圖十二）。此符左右兩半俱在，膠固為一，整體為伏虎形圓雕，錯金銘文自虎肩至臀部有兩行共十二字，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左右兩符銘文相同。

王國維〈秦陽陵虎符跋〉曾將陽陵符與傳世漢虎符相比較，指出陽陵符非漢

129 同註 127。

符，其主要證據是：漢代虎符銘文皆銀錯，云「與某郡守爲虎符」，刻於銅虎脊背，合而後可讀，肋下有記數字，這與陽陵符大有區別。¹³⁰ 但考察已見著錄的漢代虎符，銀錯居多，亦有金錯書者，如臨袁侯虎符；¹³¹ 銘文多刻於脊背，合而後可讀，但亦有左右符兩半銘文全同者，如堂陽侯虎符；¹³² 唯肋下記數字，確爲漢代虎符之特色而爲秦符所無者，陽陵符肋下無記數字。從銘文格式來看，陽陵符「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顯係沿襲杜符、新鄭符而來，至於「用兵五十人以上…」等規定，可能行之既久，節略不再細說，這也可證陽陵符爲秦符。

王國維還提出四點理由指出陽陵符爲秦物：一是《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陽陵侯傅寬」，亦見於〈列傳〉，是高帝時已有陽陵，漢因秦名；二是此符字數左右各十二，共二十四字，合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爲紀」之記載；其三，此符「文字謹嚴寬博、骨勁肉豐，與泰山、琅琊臺刻石大小雖異而體勢正同，非漢人所能仿佛」；其四，此符左右兩半俱在，「蓋子嬰於降漢時，斂左符而並獻之」，「藏之故府既久，中生鏽澀，遂不可開」。¹³³ 從銘文方面來看，王氏謂其體勢與刻石相同，非漢人所能仿佛。關於字體，王氏有更詳細的論說：

李斯書存於今者，僅泰山十字耳，琅邪臺刻石則破碎不復成字，即以拓本言，泰山刻石亦僅存二十九字，琅邪臺雖有八十五字而漫漶過半。此符乃秦重器，必相斯所書，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晰，謹嚴渾厚，徑不過數分而有尋丈之勢，當爲秦書之冠，惜係錯金爲之，不能拓墨耳。此符甲字作甲，从古文甲；在字作十，亦猶用古文，不用小篆，而會稽刻石「數動甲兵」之「甲」，嶧山刻石「維初在昔」之「在」，皆與今小篆同，殆兩刻皆在

130 《觀堂集林》，頁892-893。

131 瞿中溶：《集古虎符魚符考》，收入陳乃乾輯《百一廬金石叢書》（1921年海昌陳氏影印本）第6冊，頁2-3。

132 傅振倫：〈西漢堂陽侯錯銀銅虎符考釋〉，《文物天地》1990年1期，頁43-44。

133 同註130，頁894。陽陵符兩半俱全，究其原因，恐未必是子嬰「斂左符而並獻之」，也有鑄成而未用的可能。

同一文字之後，此符之作，尙在其前也。¹³⁴

案之《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號曰皇帝」，是在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之時，「書同文字」亦在同年。如王國維之說，則陽陵符必在稱皇帝之後且在同一文字之前，其時間必限定於始皇二十六年間。而王氏所舉「甲」字，在同一文字前後的寫法，並不一定有明確截然的區分。「甲」字在杜虎符、詛楚文、新郢符中皆作「𠂔」，秦陶文作「𠂔」，《三體石經·君奭》篆體「甲」作「𠂔」，東漢袁敞碑作「𠂔」，陽陵虎符的「甲」字作「𠂔」，與其前後的金石文字資料大體相似。會稽刻石的「甲」字作「𠂔」，中間豎畫不出頭，與《說文》小篆同而與秦及西漢金石所見「甲」字不同。傳世的會稽刻石爲摹刻本，是否足以作爲秦刻石篆體的代表，頗值得懷疑，不能排除其根據《說文》篆體改寫的可能。又，王國維所舉的「在」字，在戰國秦漢間也有變化。西周金文「在」字多假「才」爲之，寫作「𠂔」，其例甚多，春秋秦公罇作「𠂔」、秦公簋作「𠂔」，戰國秦封宗邑瓦書亦作「𠂔」，皆與西周金文一脈相承。西周金文亦見从土之「在」，如孟鼎作「𠂔」、啓尊作「𠂔」等，但數量不及作「𠂔」者。春秋戰國東土各國也見作「𠂔」者（如欒氏壺及璽文習見），中山器則作「𠂔」，不从土。睡虎地簡假「才」（𠂔）作在，但也有寫作「𠂔」之「在」，兩者並見，足見「在」字在秦統一前後是有兩種寫法，嶧山碑作「𠂔」與《說文》小篆同。漢代以後，「才」字與「在」字的字形就大致分立了，馬王堆帛書中的「在」字作「𠂔」，不再假「才」字爲之，三國吳天璽紀功碑「才」字作「𠂔」，「在」字作「𠂔」，都是明顯的例子。陽陵符「才」字作「𠂔」，與杜虎符、新郢虎符同，是秦文字中標準篆體。

王國維舉「甲」「在」兩字討論陽陵符的年代，是很敏銳的，但筆者認爲在秦統一前後，此二字的形體都還有變動，就不宜以後代重新摹刻的會稽、嶧山碑之字形爲根據，而將陽陵虎符年代定於「同一文字」以前。陽陵虎符的年代，宜訂於秦王稱皇帝之後，降漢之前，即 221 B.C. - 206 B.C.。

134 同註 130，頁 895。

（五）疑偽的東郡虎符

東郡虎符是 1952 年由陝西省周至縣文化館所徵集，根據王輝的說明，此符一套兩枚，符作臥虎形，長 9.5、高 4.3 厘米，左右兩符同銘，錯金書，但右符有的字已剝去，左符則較清晰，由於原徵集者已辭世，繳獻者、出土地點、徵集經過等，今已無法確知，加上銘文有剝痕，又有錯字，遂有人以為偽器，不予重視，國內至今未見著錄（見附圖十三）。¹³⁵

羅福頤《商周秦漢青銅器辨偽錄》認為東郡虎符為偽品，其說曰：


秦器中還有虎符，近見亦有偽品，只是作品太劣，與真品對照，其偽立見。

今將其真偽品照片列下。上為秦陽陵虎符真品，下民國初年估人偽造品，從形制銘文上都有錯誤。¹³⁶

可是羅福頤並未詳細說明東郡虎符形制及銘文上的錯誤何在。

東郡虎符過去未見著錄，以下的討論所根據的是羅福頤《商周秦漢青銅器辨偽錄》中所列的東郡虎符照片及王輝的銘文摹本。王輝曾對此符有深入的觀察，其銘文摹本應該可信，其討論也值得在此先加介紹。¹³⁷

從形制方面來看，王輝認為秦虎符早期為立虎，如杜虎符，其後新郢、陽陵兩符皆伏虎，東郡虎符合於秦符從立虎向臥虎發展的演變規律。虎符的長度，杜虎符為 9.5 厘米，新郢符 8.8 厘米，陽陵符約 9.2-9.48 厘米，東郡符長 9.5 厘米，與陽陵符等相差無幾。就虎形的結構而言，東郡虎符與陽陵符大體相同，較新郢符，則尾稍粗，頭稍圓略腫，從銘文的格式來看，東郡虎符除郡名外，與陽陵符全同，是杜符、新郢符銘文的節略。這合於秦虎符銘文由繁趨簡的演變規律。筆者基本上都同意王輝的看法，至於羅福頤所謂形制上有誤，不知何指，或即指東郡虎符頭圓體腫而言。

從銘文的字體方面來看，王輝已指出兩點錯誤，一是左符「杜東郡」的

135 王輝：〈周秦器銘考釋（五篇）〉，《考古與文物》1991年6期，頁79。

136 羅福頤：《商周秦漢青銅器辨偽錄》，頁35-36。

137 以下所引王輝的意見，皆出自〈周秦器銘考釋（五篇）〉之五〈東郡虎符〉，不再一一註明。

「杜」爲「在」字之誤，其二是右符的「甲兵之符 𠂔 帝」的「𠂔」字爲「右」字之誤。王輝認爲「東郡虎符誤在爲杜，應是受戰國末及秦代『在』字的影響，因爲在與杜同从土，而杜所从木旁又與在所从才旁形近。也說明器銘作者是秦人或漢初人，所以熟悉在、杜二字在當時的寫法，也知道秦有杜地（秦武公十一年秦初縣杜），只是因爲一時粗心，才誤在爲杜」。¹³⁸ 關於誤「在」爲「杜」，王輝的討論相當仔細。

但是，東郡虎符銘文致疑之處，不僅於此。例如「甲兵」之「甲」，前文已討論過，戰國秦漢間之金石文字皆作「𠂔」，中間豎畫出頭，唯傳寫之會稽刻石及《說文》小篆作「𠂔」，東郡虎符亦作「𠂔」，中間豎畫不出頭，與秦漢間金石文字所見皆異，此差異雖小卻頗堪玩味。再看「在」字的寫法，前文亦討論過，或假「才」爲之，或加「土」作「在」「𠂔」，假「才」爲之者或中間填實作「𠂔」、或中間不填實則作「𠂔」，或省爲「𠂔」，皆習見，偶有變體作「𠂔」（曾姬無卣壺）或「𠂔」（曾侯乙鐘），東郡符右符的「在」字作「𠂔」，爲古文字中前所未見者，值得深思。

以上「甲」「在」二例，僅是點畫之間有些出入，東郡虎符銘文最大的錯誤在於左右倒置，右符銘「甲兵之符 𠂔 才 帝 □ □ □ □」，左符曰「甲兵 □ □ □ □ 帝 𠂔 杜（在）東郡」，而從來兵符皆右在君王而左符交付地方將領或郡守，未有「左在皇帝」之例。再看左符「𠂔 杜（在）東郡」銘文，相對於「左在皇帝」，則「𠂔」應是「右」字。戰國時期，左右二字之區別大抵有兩種方式，一是以𠂔（左手）加「工」爲「左」，𠂔（右手）加「口」爲「右」，這是比較常見的；另一種是皆加「口」，但以「𠂔」「𠂔」爲區別，如包山楚簡。個別的有𠂔（右手）加「工」者（《秦代陶文》572），也有𠂔（左手）加「口」者（如《古陶文彙編》5.290 秦都咸陽陶文），這兩者比較難斷定左右。東郡虎符因有銘文「𠂔 在 帝」做對文比較，可以確定「𠂔 在 東郡」是「右在東郡」。¹³⁹ 因此，

138 關於「在」字的變化，前文論陽陵符時已有字例說明。爲免重複，王輝文中此段討論，沒有全段照引。

139 西周器班簋銘文左右二字作「𠂔」「𠂔」，從上下文可確定「𠂔」爲「左」字。戰國時期，从工者，不論从𠂔或从𠂔，都可定爲「左」字；从口从𠂔者，則較難確認，

東郡虎符銘文「左在皇帝」「右在東郡」，不是字形點畫上的錯誤，而是左右倒置，不合體例的錯。從照片上看來，「左」「右」二字並無剝痕，¹⁴⁰ 似無改錯重作之意，這樣的錯誤，很難以粗心解釋。

「東郡」為秦之郡名，《史記·秦始皇本紀》「五年，將軍鶩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¹⁴¹ 〈六國年表〉〈蒙恬列傳〉所記略同，是東郡之置，在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¹⁴² 東郡虎符銘文有「皇帝」，其上限應在始皇統一天下立為皇帝之後，下限應在孺子嬰降漢之時，即221 B.C.-206 B.C.之間。王輝認為東郡虎符與漢齊郡虎符（《文博》1990年6期）同有郡名，又秦二世時東郡一帶戰事頻仍，東郡虎符之製作可能在秦二世胡亥到降王子嬰的三年間，即209-206 B.C.之間，亦可備一說。

如果東郡虎符為真品，其年代約在221 B.C.-206 B.C.之間，基於前述銘文上的諸多疑點，筆者認為應暫且存疑。

附帶討論二件被舊著錄指稱為秦代兵符的文物。其一是《善齋吉金錄·符牌錄》頁4所錄「秦甲兵虎符」（左符）一件（見附圖十五），編者劉體智認為是秦代兵符。此物從白描圖形看來，虎之四肢直立，但形體萎靡，與杜符、新鄴、陽陵諸符全不相類。符陰胸頸處有三角形接榫，銘文「甲兵之符左□」，刻於符陰（內部剖面），此為歷代兵符所未見之制，且銘文字體柔弱，格式亦不類，其為偽符大概可以確定。

另一件是《善齋吉金錄·符牌錄》2所錄名為「秦王命虎節」者，此物作獸

若從上下文也難判斷時，一般字書多將「口」者收為「右」字。

140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王輝先生受筆者之託，特地再仔細觀察東郡虎符實物，並來函表示：根據目驗，此二字確無剝痕。

141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24。

142 《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頁751；卷八十八〈蒙恬列傳〉，頁25-65。又《史記》卷三十七〈衛康叔世家〉，頁1604，曰「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初置東郡」，案：元君十四年為239 B.C.，此記載與〈始皇本紀〉〈六國年表〉皆異。

頭形，鑲金，正面獸額上有「王命」二字，背後頭下部有「大攻君□□」銘文（見附圖十五）。編者劉體智認為是秦代兵符。案此物與秦虎符造型全不相類，從銘文看，「攻君」即「工尹」，其職略當於「工師」，「工君」一詞習見於燕趙諸國器上，如「左攻君」、「右攻君」。「大攻君」一詞，亦見於趙國兵器，如十五年守相空波劍（《三代》20.47.2）背有「大攻君孫桴」銘文。楚國亦有「大攻尹」官，見於鄂君啓節等，但楚文字作「𠂔」不作「𠂔」。《善齋》所錄此鑲金獸頭王命節，宜名為「王命大攻君節」，可以肯定不是秦物，比較可能是燕趙之物，甚或可能為偽品，暫且存疑。

戰國秦楚之虎符，造型不同，楚為平版浮雕，秦為立體圓雕，至於魏國兵符，僅知其為虎形，細節不知其詳。從秦兵符看來，當時兵權集於中央，虎符是頒給郡以下的地方單位（杜為縣名；新鄴、陽陵未知是否置縣，但為郡下之行政單位則可確定）。但這些地方單位的主管（或將領）除燔燧事外，一切唯王命是聽。戰國晚期，秦與六國之間，戰事頻仍，規模亦大，動輒數萬兵衆，然發兵五十人以上，需會王符，則中央權力甚大可知。

戰國到秦亡之前，秦國兵符形制略有沿革，造型由立虎而為伏虎，銘文的書寫格式，先是由背到腹書寫，改為由頸向尾書寫。早期銘文對發兵有較詳細的規定，統一之後，各項規定行之既久，不需重申，僅為「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而已。就銘文字體而言，杜虎符、新鄴符與秦封宗邑瓦書、詛楚文等大致相似，可以看出戰國中晚期篆體逐漸定型的過程。銘文筆劃較秦刻石的篆體顯見較多方折的特點，秦書八體之一的「刻符」，可能就是指這種刻於符節上、筆劃較為方折的字體，基本上這只是篆體的應用，並非別有一體。¹⁴³

漢初天下大定後，高祖六年（201 B.C.）曾「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

143 唐蘭認為新鄴、陽陵符是錯金書，非刻文（《中國文字學》，頁158），其意蓋不以虎符銘文為「刻符」。其實錯金的過程必先鑿刻字槽，再將金絲或金片嵌入字槽中，說為「刻文」似無不可。

封」，¹⁴⁴ 封靳歙爲信武侯「剖符世世勿絕」，¹⁴⁵ 剖符行封是否就是剖分虎符，以賦與兵權來象徵封侯的實質地位，還是另有封侯之憑信，史無明徵。孝文帝二年（178 B.C.）「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史記·孝文本紀》）、到景帝中元二年（148 B.C.）「更郡守爲太守」（《漢書·景帝紀》，則漢代虎符銘文有「郡守」者，年代宜在 178 B.C.-148 B.C. 之間，如南郡守虎符（《符牌圖錄》6.4）；¹⁴⁶ 銘文曰「太守」者，年代宜在 148 B.C. 之後，如齊郡太守虎符（《文博》1990.6）。新莽時期，虎符銘文略異，不僅有郡名，亦有縣名，如河平郡守虎符銘曰「新與河平羽貞連率爲虎符」（《符牌圖錄》7.2），¹⁴⁷ 河平爲郡名，羽貞爲縣名，連率即太守。¹⁴⁸ 漢代虎符左右脅下皆有記數字，多不過五，可印證應劭「銅虎符第一至第五」之語。至於漢代所見諸侯兵符三件，爲堂陽侯虎符（《文物天地》1990.1）、安國侯虎符（《符牌圖錄》3.2）、臨袁侯虎符（《符牌圖錄》3.3），銘文左右兩符相同，與郡守、太守符、新莽符銘文寫在背脊中分處不同，應是秦代虎符書寫形式的遺留，宜爲西漢之物。¹⁴⁹

東漢之初，曾有一短時間以璽書發兵，光武帝建武七年（31 A.D.），杜詩上書曰：

初，禁錮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書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會

144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頁384。

145 《史記》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傳〉，頁2710。

146 《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頁1566，「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莽曰南順，屬荊州」。是南郡守虎符應在文帝二年（178 B.C.）之後，景帝二年（155 B.C.）之前。

147 「羽貞」二字據王國維：〈記新莽四虎符〉（《觀堂集林》卷十八，頁896-897）考訂補入。

148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傳〉，頁828-829，「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注云：「莽改上郡爲增山，連率亦太守也」。

149 據《史記》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堂陽侯於景帝中六年（151 B.C.）除國（頁955）；臨袁侯於武帝元鼎五年（112 B.C.）除國（頁959-960）；安國侯亦元鼎五年除國（頁924）。

合，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尙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書奏，從之。¹⁵⁰

這一段話說明虎符之使用及其重要性，甚爲精要，引以爲本節之結語。

五、結語 — 兼談「合符」的問題

有關先秦符節的文獻資料，以《周禮》記載較詳，《周禮》鄭注及《墨子》也提供了許多相關訊息，除此之外，大概就得從史傳中爬梳出一鱗半爪，才能拼湊出先秦符節制度的簡單藍圖。至於符節的實物如何，則有賴於清代以來，各著錄家對符節實物的收集、摹拓，晚近亦陸續出土有符節實物，這些材料使我們具體的看到古代符節的真實面貌，加上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相關的記載，逐漸使我們稍有能力在原先拼湊的簡單藍圖中，添加一些細節。

本文中共討論八件「王命=遡賃」節，其中七件爲龍首牌狀形、一件爲平版虎形，皆爲戰國楚物，楚王在節中要求官方設立的傳舍提供飲食給持節者。本文中亦談到三件戰國齊之動物形符節，是爲發傳車之用，另有三件燕國動物形符節，皆與古代的傳遽制度有密切關係。本文中還討論楚王命車駐虎節及秦的杜虎符、新鄭虎符、陽陵虎符，以及疑僞的東郡虎符和兩件被誤認爲秦兵符的符節（一件爲僞、一件爲列國「王命大攻君」節），並略述漢代虎符的演變。這些虎符爲戰國秦漢以虎符發兵及相關規定，提供見證。

本文以戰國至秦亡這一段時間爲範圍，以可見的符節摹本、拓本及照片爲基礎，從古文字學的立場，討論這些符節的銘文、時代、國別、真僞等問題，期望對這些符節實物能給予清楚的定位，並爲符節制度提供具體的物證。

附帶一談「合符」的問題，這是討論符節不能不談、卻又暫時無法談清的問題，在此只能簡單一說。戰國時期的立體動物形符節，符陰處皆有形狀不一的凹

150 《後漢書》卷三十一〈杜詩傳〉，頁1096。

凸樁以供合符之用，身上常有穿孔，亦可能為插樁合符而設。新鄴虎符的穿孔在胸脅部及尾部各一，其中胸脅處的穿孔直徑約 0.6 厘米，銘文通過此處時，為此穿孔所破壞，造成三個字殘損（「必」字左半、「燧」字右下角、「事」字右上角），從這個情況看來，這個穿孔應該可以容納一個活動的插樁，刻寫銘文時，此插樁填在穿孔中同刻，當左右合符時，將插樁插入此穿孔中，銘文可以補足完好如初。如果這個推測不誤，我們不禁要為前人的巧思讚嘆不止！¹⁵¹ 其他各節的穿孔正好在沒有銘文之處，就體現不出這般細密的設計。秦代的陽陵符以及漢代的許多虎符，主要以凹凸樁合符，不再有穿孔。漢代虎符（諸侯符除外）還將銘文刻於對剖中分處，必會兩符才能讀出銘文，這也是防止訛詐的另種巧妙安排，這種設計在戰國齊節（《貞松堂集古遺文》11.12）中已經出現。¹⁵²

至於龍首牌狀符節和平版虎形符節，從物體本身來看，似乎找不出任何為合符而作的設計，因此，它如何合符？或是否須要合符？就成了很難回答的問題。從鄂君啓節來看，不論車節或舟節，都是一套五片（銘文相同），合五片為一圓筒形竹節。如何合符，也很難想像。銘文中有「𠄎其金節則毋征」「不𠄎其金節則征」，「𠄎」釋為「得」，¹⁵³「得其金節」是包含勘驗合符？抑或只是掌節者目驗即可為憑信？杜虎符銘文有「必會君符」、新鄴虎符有「必會王符」，《史記》記載信陵君盜得虎符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這些兵符都明確記載會符、合符之事，而鄂君啓節的「得其金節」似

151 侯錦郎認為符胸的穿洞可能為接受右半凸出之筍而設，尾部的小圓孔似為穿繩佩戴之用。見侯文，頁 45。

152 將同樣的銘文分別書於左右兩符上，稱為「質劑」，《周禮·天官·小宰》「聽買賣以質劑」下，鄭注曰：「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秦虎符及西漢諸侯虎符皆質劑式。將銘文書於兩符中分對剖處，合符而後得全字者，稱為「傳別」，〈小宰〉「聽稱責以傳別」下，鄭注曰：「傳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貞松堂集古遺文》11.12 所著錄的錯金虎節和漢郡守、太守虎符皆傳別式。

153 「𠄎」字，許多考釋鄂君啓節銘文的學者皆釋為「見」，于省吾最先釋為「得」（同註 53）。得字从手持貝會意。𠄎从目从手，从目為从貝之省。貝省為目，戰國文字習見，例多不勝舉。楚帛書、中山王器中的「得」字全部从目作「𠄎」。

無會符之意。¹⁵⁴ 這為我們思考龍形牌狀符節和平版虎形符節是否符合的問題，提供一些線索。但目前似難有肯定的答案。

（本文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通過刊登）

後 記

本文撰寫期間，曾與本所前輩李孝定先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王輝先生討論，承蒙兩位先生指教，受益良多。本文初稿於八十三年六月初在本所講論會上討論，本組同仁及所裡多位先生都曾給予寶貴的意見，裘錫圭先生亦曾來信多所指正，謹此致謝。文中部份珍貴資料，承李宗焜先生及李存智女士協助，亦在此敬致謝忱。

承裘先生告知，李家浩先生有〈貴將軍虎節與辟大夫虎節—戰國符節銘文研究之一〉一文，刊登於《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3年第2期。筆者寫作此文時，未能得見李先生大作，甚為遺憾。李先生曾親至中國歷史博物館，觀察舊題為「韓將庶信節」的虎節實物，考證其銘文為「填丘牙（與）塿紛貴牆（將）軍信節」，填丘即營丘，指齊都臨淄，塿紛為地名，可能在山東膠縣境內，「貴將軍」之「貴」讀為「銳司徒」之「銳」，指掌管銳兵之將軍。此節為從齊國都臨淄發給塿紛地區管銳兵的將軍的信節，名稱應為「貴將軍虎節」。李氏文中指出《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2著錄的「辟大夫信節」銘文應為「〔填〕丘牙（與）塿紛辟大夫信節」，亦為臨淄發給塿紛地區掌管叁壁的大夫的信節（「辟」借為「叁壁」之「壁」）。李氏此文對「貴將軍虎節」及「辟大夫虎節」的銘文及相關的地理和制度等問題討論甚詳，很值得參考。本文附圖十四已將李先生的「貴將軍虎節」銘文摹寫採入其中，以便參看。

154 于氏釋「得」至確，並引《考工記，輪人》「牙得則無槩而固」，鄭注「得謂倨句鑿內相應」說「得」字。但鄂君啓節並無鉏牙可相應而得，所以「得」字，是否表示「合符」，仍待討論。

陝西考古研究所王輝先生曾著有論文認為「東郡虎符」是真品，筆者寫作拙文時曾通信向王先生請教並提出諸多疑點，王先生皆非常誠懇的面對問題，再作思考，並告知即將出版的《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1期中有王關成著〈東郡虎符考〉一文（頁64-65），看法與筆者相近。王輝先生表示對「東郡虎符」真偽問題的看法已有轉變，改為持疑的態度。筆者一方面竊喜於另有學者的看法與自己不約而同，一方面對於王輝先生坦蕩求真的襟懷，極感佩服。王關成〈東郡虎符考〉認為此符銘文左右顛倒，違反古制；「兵」、「又」、「郡」三字結構不符慣例；「在」字一字二書；「之」字筆道曲柔纖弱，判定此符非真品。請讀者參看。

關於楚節「王命命邇賃」銘文的意義，本文中僅並存異說，沒有建設性的看法。「邇賃」一詞的含意，仍待來日有新材料時，再作進一步的討論。裘錫圭先生來信中指出：「邇賃」之「賃」以解釋為「負任」之「任」為好，負物為「任」，運物之車古亦曰「任車」。「命傳任」或是命傳遽派人、派車為持節者負物、運物之意。裘先生此說亦可供參考。

李家浩先生於1994年8月在廣東東莞舉行的紀念容庚先生百年誕辰暨第十屆中國古文字學學術研討會上提出〈南越王墓車駟虎節銘文考釋〉（提要），認為南越王墓「王命命車駟」節銘中的「駟」字所从的「𠂔」應釋為「壺」，即「執」的省寫，節銘「駟」字應是「駟」字的異體。此亦可備一說。

八十三年十月廿五日

參考書目

《史記》、《漢書》、《後漢書》，中華書局點校本。

《周禮》，十三經注疏本。

《戰國策》，台北：九思出版公司，1978。

《淮南子》，四部叢刊初編本。

于省吾《雙劍謠古器物圖錄》，北京：大業印刷局，1940。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駟傳制度〉，《吉林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年2期，
頁78-114。

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于省吾〈鄂君啓節考釋〉，《考古》1963年8期，頁442-447。

大庭脩《漢の銅虎符と竹使符》，《鎌田博士還曆記念歷史學論叢》，東京：東
通社出版部，1969，頁43-54。

王叔岷《史記斟證》，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王國維著、羅福頤校補《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北平：墨緣堂，1933。

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台二版。

王 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王 輝〈周秦器銘考釋（五篇）〉，《考古與文物》1991年6期，頁75-81。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石志廉〈對“銅龍節”一文的商榷〉，《文物》1961年1期，頁72。

史樹青〈我國古代的金錯工藝〉，《文物》1973年6期，頁66-72。

朱捷元〈秦國杜虎符小議〉，《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1期，頁53-55。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年1期，頁73-

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文物》1979年1期，頁42-52。

朱德熙、李家浩〈鄂君啓節考釋（八篇）〉，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61-70。

阮 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清嘉慶間初刊本。

阮 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光緒九年(1883)知不足齋刊本。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9。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下），《文物》1959年9期，58-61頁。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編〈燕下都第23號遺址出土一批銅戈〉，《文物》1979年8期，頁42-50。

周祖謨《方言校箋》，台北：鼎文書局，1972。

柯昌濟《金文分域編》，1930年餘園叢刻本。

胡順利〈關於秦國杜虎符的鑄造年代〉，《文物》1983年8期，頁88。

侯錦郎〈新鄭虎符的再現及其在先秦軍事、雕塑及書法研究上的意義〉，《故宮季刊》10卷1期，頁35-77。

流 火〈銅龍節〉，《文物》1960年8.9期，頁82。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參），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徐中舒、伍士謙〈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堂圖說明〉，《中國史研究》1979年4期，頁85-98。

容 庚《秦漢金文錄》，北平：中研院史語所，1931。

馬非百〈關於秦國杜虎符的鑄造年代〉，《文物》1982年11期，頁85。

高 明《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

高 敏〈秦漢郵傳制度考略〉，《歷史研究》1985年3期，頁69-85。

- 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啓節”〉，《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頁8-11。
- 孫稚雛《金文著錄簡目》，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唐 蘭〈懷鉛隨錄·新鄴虎符作於秦王政十七年滅韓後〉，《申報》1948年6月26日〈文史〉版。
- 唐 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據開明書店1949年3月版重印。
- 唐 蘭〈王命傳考〉，《北京大學國學季刊》6卷4號(1952)，頁891-902。
- 梁玉繩《史記志疑》，廣雅書局叢書152-169冊，1920年番禺徐紹榮彙編重印本。
- 陳 直〈秦兵甲之符考〉，《西北大學學報》1979年1期，頁72。
-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增訂本)，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 郭沫若〈關於鄂君啓節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頁3-6。
- 商承祚〈鄂君啓節考〉，《文物精華》第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 商承祚《先秦貨幣文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
- 陳 偉〈鄂君啓節與楚國的免稅問題〉，《江漢考古》1989年3期，頁52-58。
- 陳尊祥〈杜虎符真偽考辨〉，《文博》1985年6期，頁25-29。
- 黑 光〈西安市郊發現秦國杜虎符〉，《文物》1979年9期，頁93-94，圖版8。
- 湯余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輯(1986)，頁9-100。
- 景明晨、劉曉華〈咸陽發現漢齊郡太守虎符〉，《文博》1990年6期，頁85-86。
- 張振林〈“𡈼徒”與“一𡈼𡈼之”新詮〉，《文物》1961年3期，頁48-49。
- 傅振倫〈西漢堂陽侯錯銀銅虎符〉，《文物天地》1990年1期，頁43-44。
- 勞 幹《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57。
- 勞 幹《居延漢簡·考釋之部》，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86。
- 馮雲鵬《金石索》，道光元年(1821)刊本。
- 曾憲通〈楚帛書文字編〉，收入饒宗頤、曾憲通編《楚帛書》，香港：中華書局，1985，頁221-334。

- 黃 濬《衡齋金石識小錄》，北平：尊古齋，1935。
- 黃 濬《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北平：尊古齋，1936。
- 鄒 安《周金文存》，上海：廣倉學寤，1921。
- 裘錫圭〈讀簡帛文字資料雜記〉，收入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一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頁26-33。
- 端 方《匋齋吉金續錄》，宣統元年(1909)有正書局石印本。
-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光緒二十八年(1902)石印本。
-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西漢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劉 雨〈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124-136。
- 劉 釗〈包山楚簡文字考釋〉，中國古文字學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抽印本。
- 劉彬徽等〈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收入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348-399。
-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1935年石印本。
- 樓祖詒〈漢簡郵驛資料釋例〉，《文史》第三輯(1963)，頁123-144。
- 戴應新〈秦杜虎符的真偽及其有關問題〉，《考古》1983年11期，頁1012-1013。
- 瞿中溶《集古虎符魚符考》，收入陳乃乾輯《百一廬金石叢書》第六冊，1921年海昌陳氏影印本。
- 羅振玉《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乙丑冬(1925)東方學會影印。
-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庚午(1930)刊本。
- 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4年上虞羅氏百爵齋據拓本影印。
- 羅福頤《商周秦漢青銅器辨偽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中心，1981。
- 羅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羅福頤《古璽文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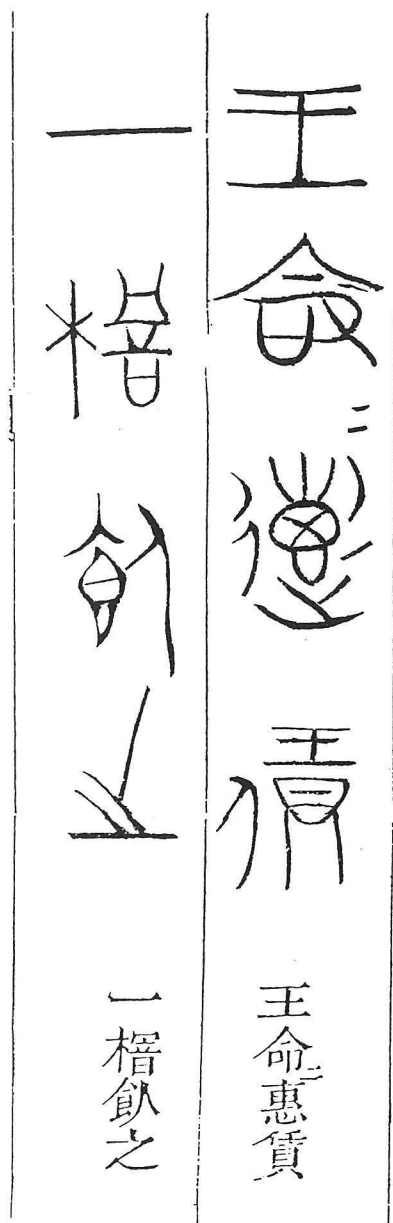
嚴一萍《金文總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84。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宏業書局，1980。

A Study of Tallies (*fu-chieh* 符節)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Era
to the Ch'in Dynasty
—with Emphasis on Artifacts

Chen Chao-jung

In this paper I discuss a number of tallies used in Warring States Message relay system. I also discuss a number of military tallies and their evolutio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and Ch'in periods. I analyze the tallies' inscriptions, periodization, national origins, and authenti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ies on ancient writings. I also use data from Ch'in and Ch'u bamboo strips, as well as other sources, to explore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ancient tallies, and the message relay system they were a part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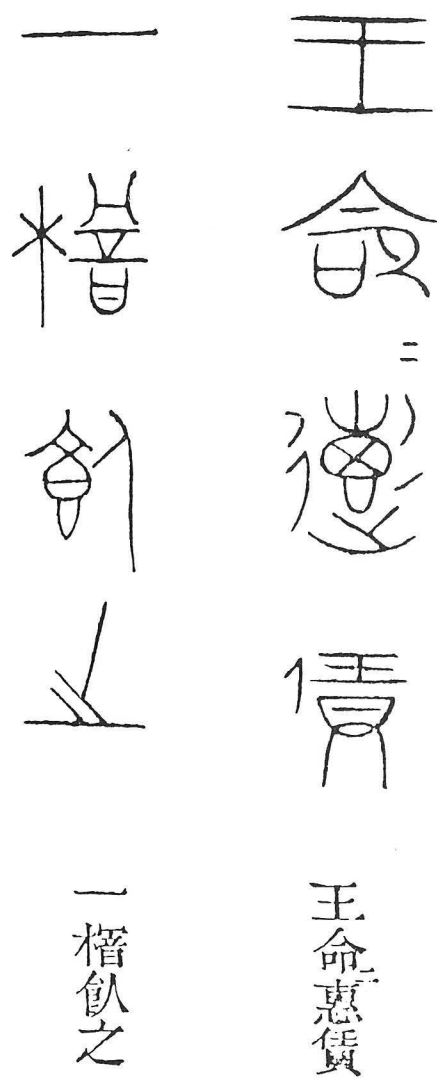
附圖一

王命 = 逋賃節

阮元摹本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10.5

(清嘉慶間初刊本)



王命 = 逋賃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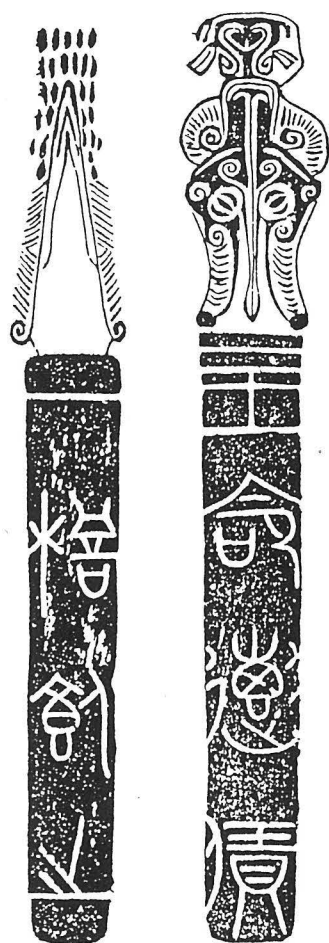
阮元摹本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10.6

(光緒九年知不足齋刊本)

周龍虎節

吳門陸貫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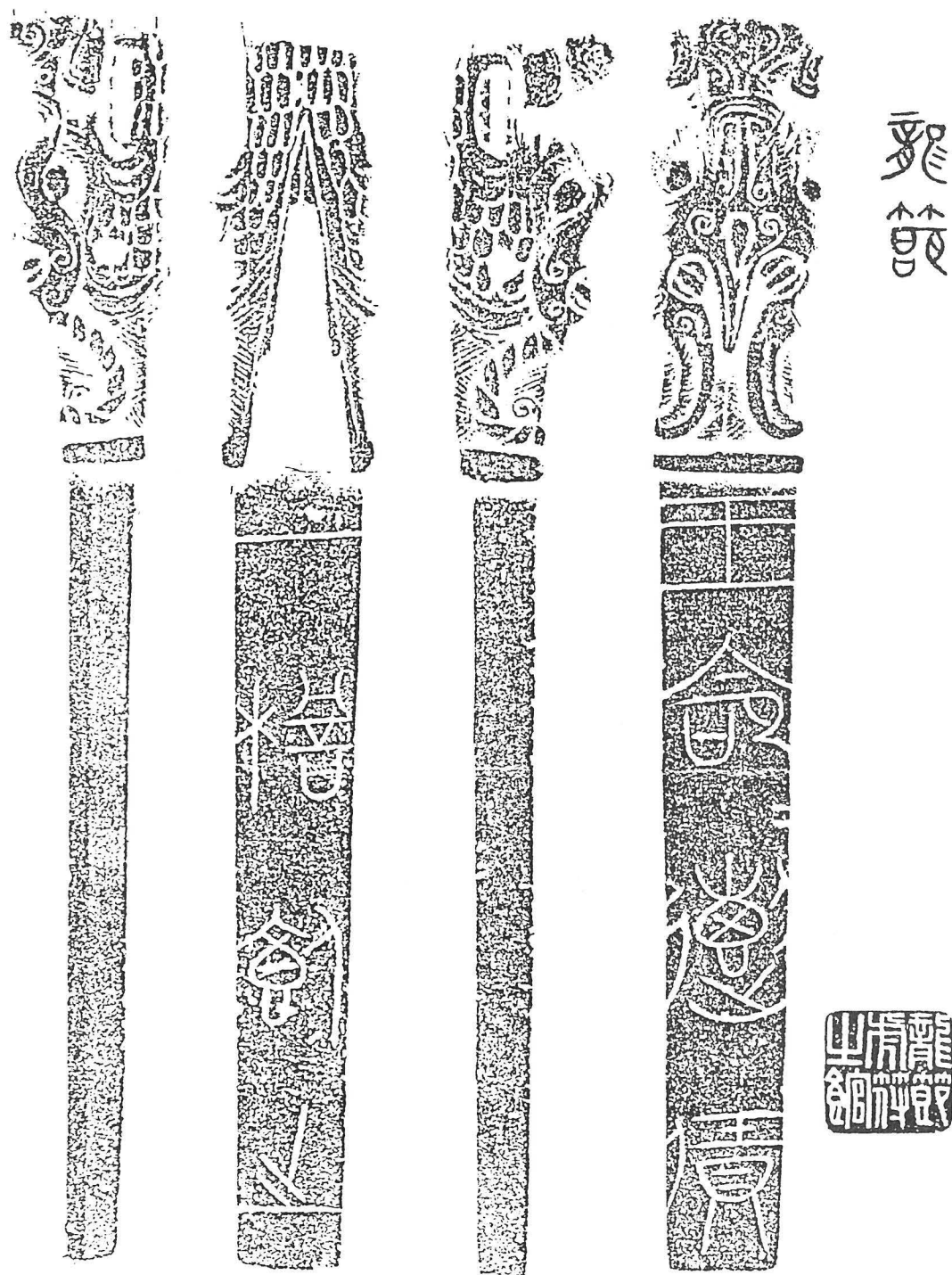


王命遯賃
一梧載之

附圖二

王命 = 遯賃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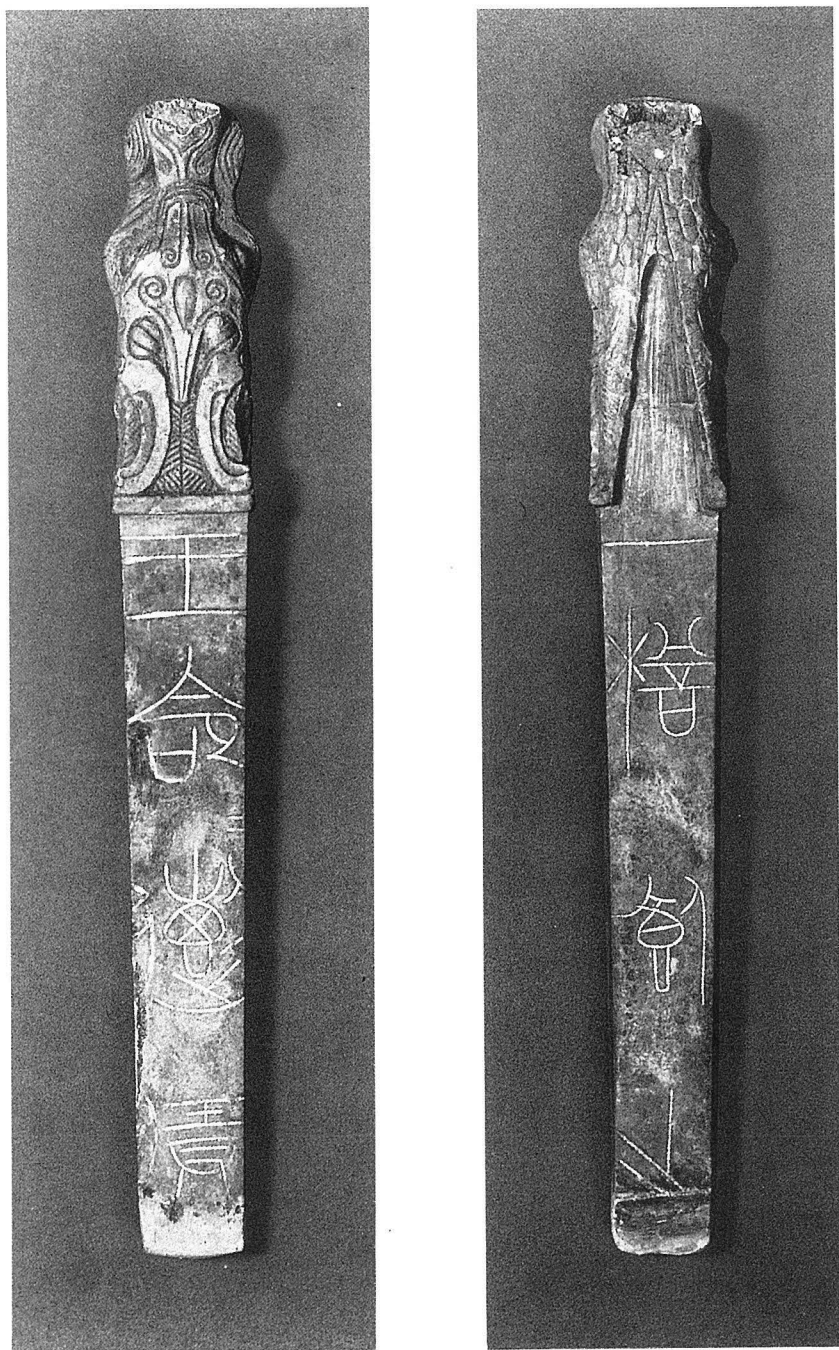
《金石索》（道光元年刊本）



附圖三

王命 = 遼賃節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9.10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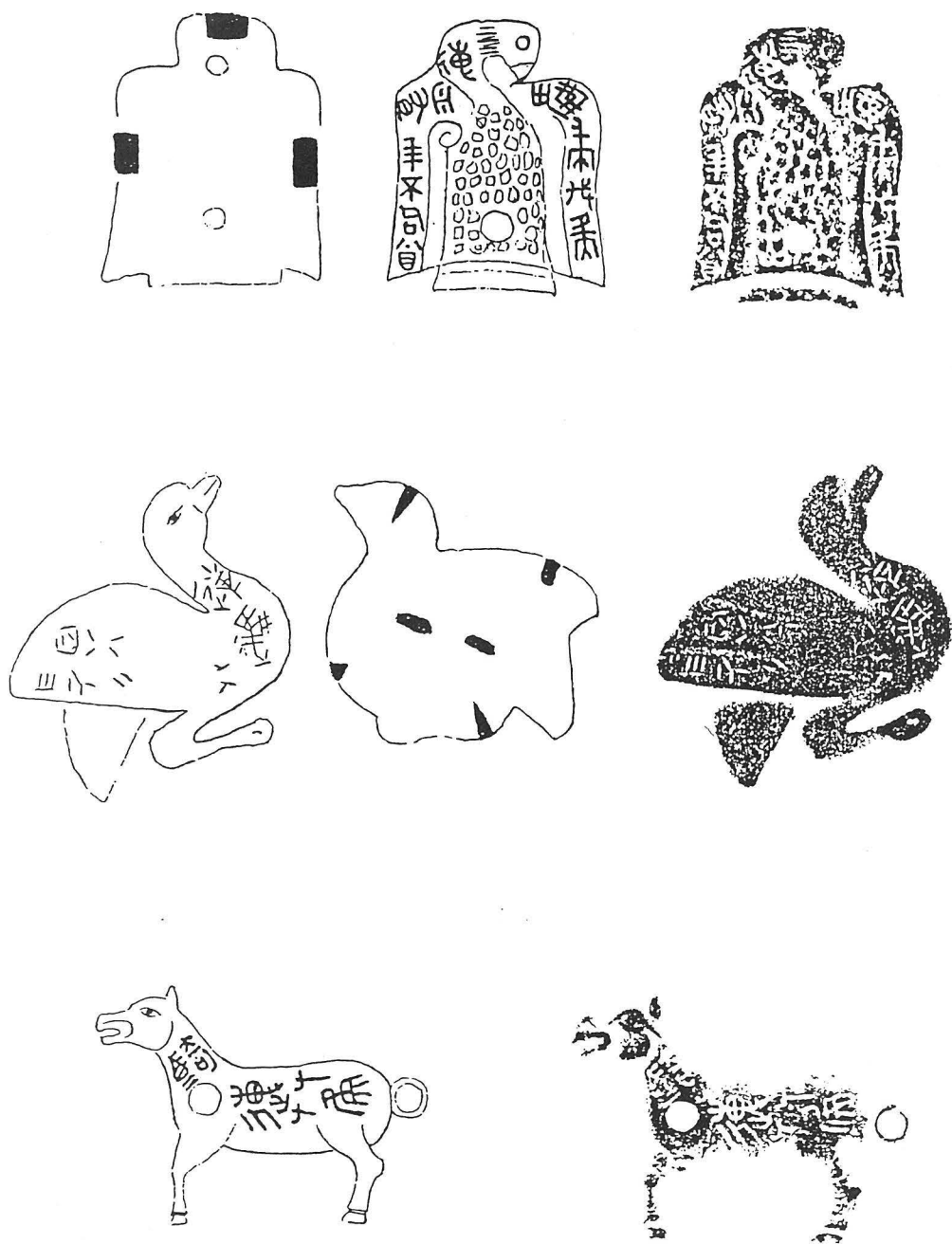
附圖四

王命 = 遯賃節 長沙黃泥坑出土

《中國歷史博物館》98.99



附圖五
王命 = 遼賃虎節
《尊古齋所見古金圖》4.47



附圖六

上：鷹節

拓片《三代》18.31.7

摹寫《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1

中：雁節

拓片《三代》18.31.6

摹寫《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1

下：騎漚侯馬節

拓片《三代》18.31.3

摹寫《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1



附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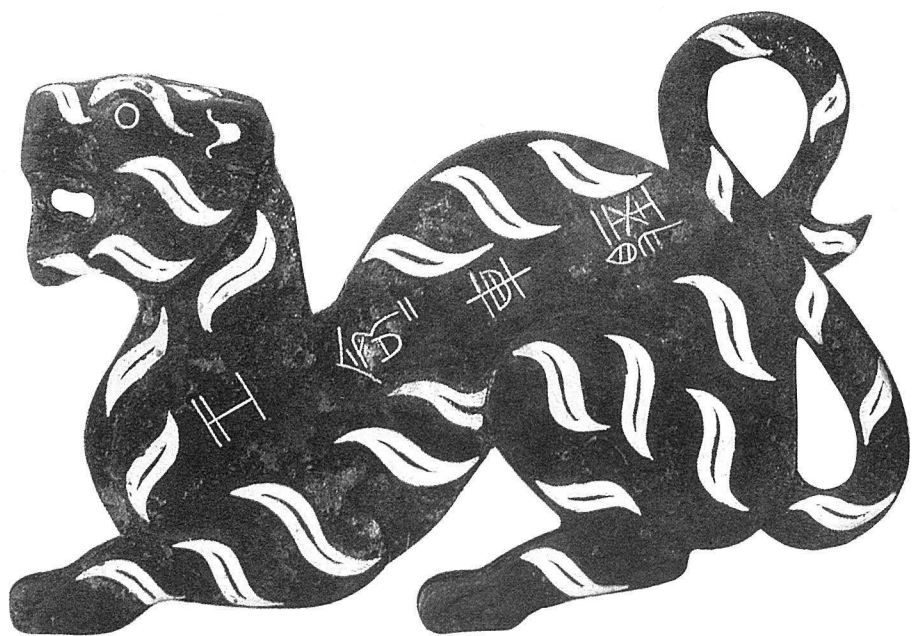
上：馬節

下左：虎節

下右：熊節

拓片《三代》18.31.5
《貞松堂集古遺文》11.12
《三代》18.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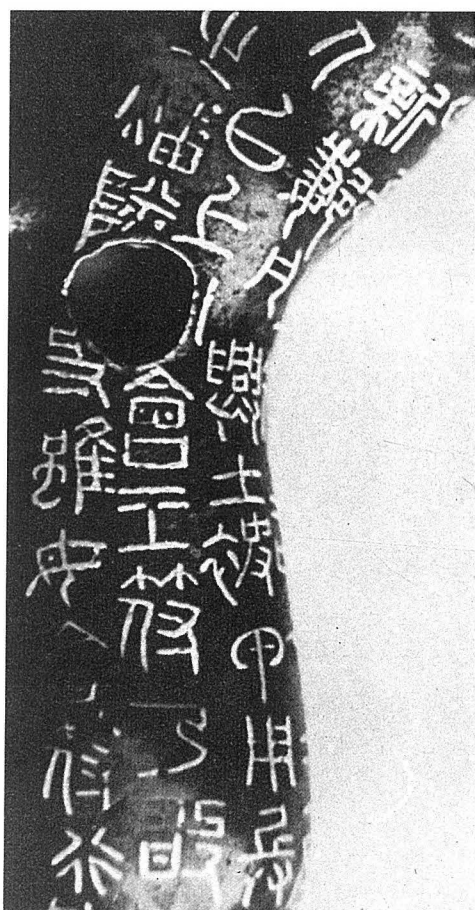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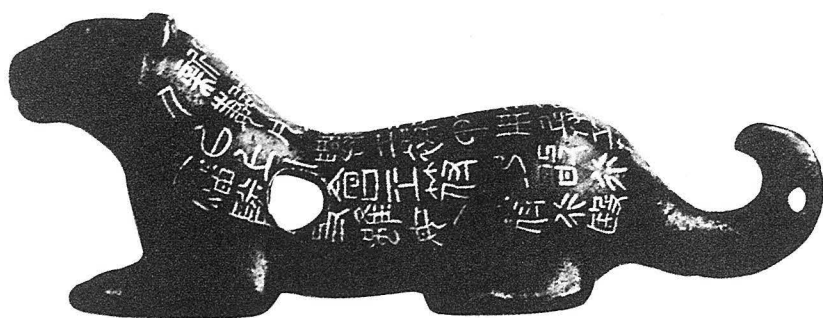
摹寫《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2



附圖八
王命 = 車駐虎節
《西漢南越王墓》圖版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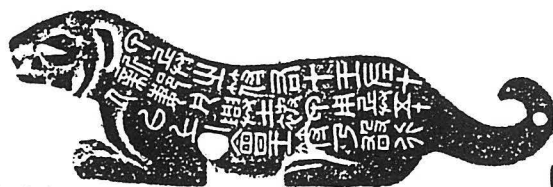


附圖九
秦杜虎符
《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下)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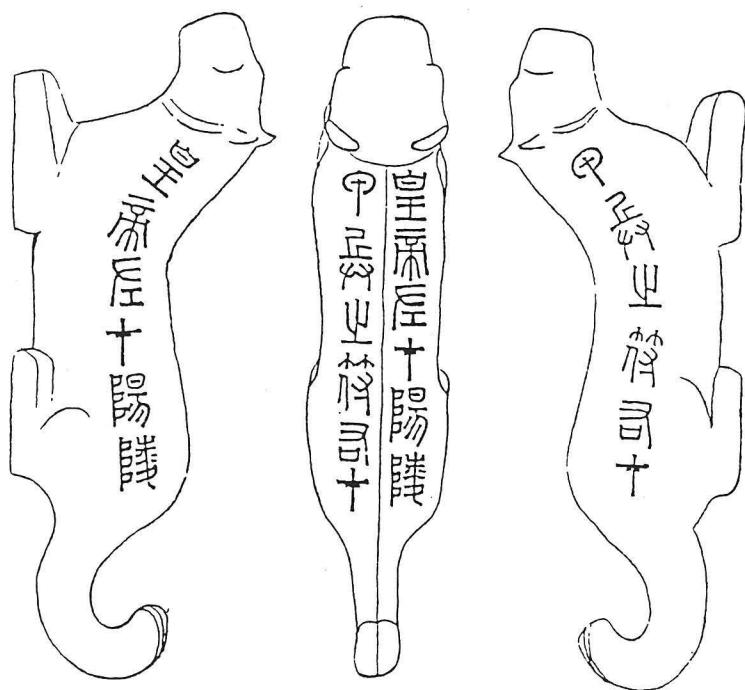


附圖十
秦新鄭虎符
《故宮季刊》10卷1期

新郵虎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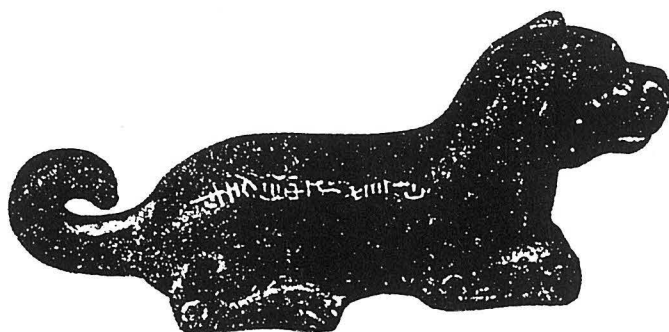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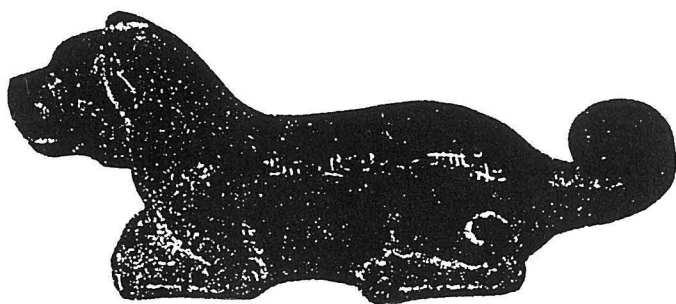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一
秦新郵虎符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



附圖十二
秦陽陵虎符

照片《中國歷史博物館》105

摹寫《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3



銘文摹本

皇帝后杜東郡
左符

皇帝后杜東郡
右符

釋文：

左符

甲兵□□□□
皇帝右杜〔在〕東郡

右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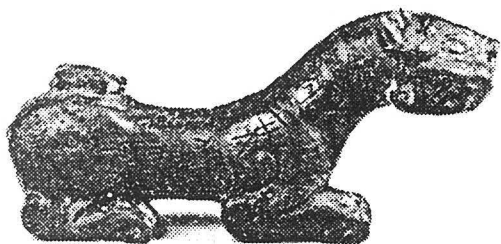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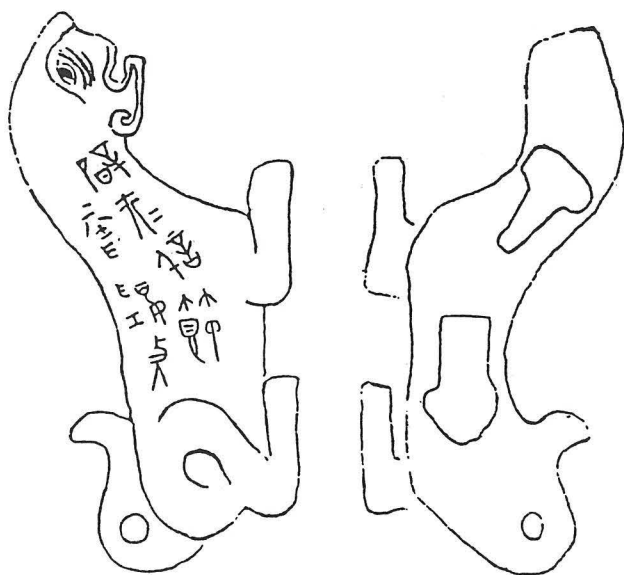
甲兵之符左才〔在〕
皇帝□□□□

附圖十三

疑偽東郡虎符

照片《商周秦漢青銅器辨偽錄》36

王輝摹寫 《考古與文物》1991.6 頁80



貴將軍虎節
韓將席信節

附圖十四

上：辟大夫信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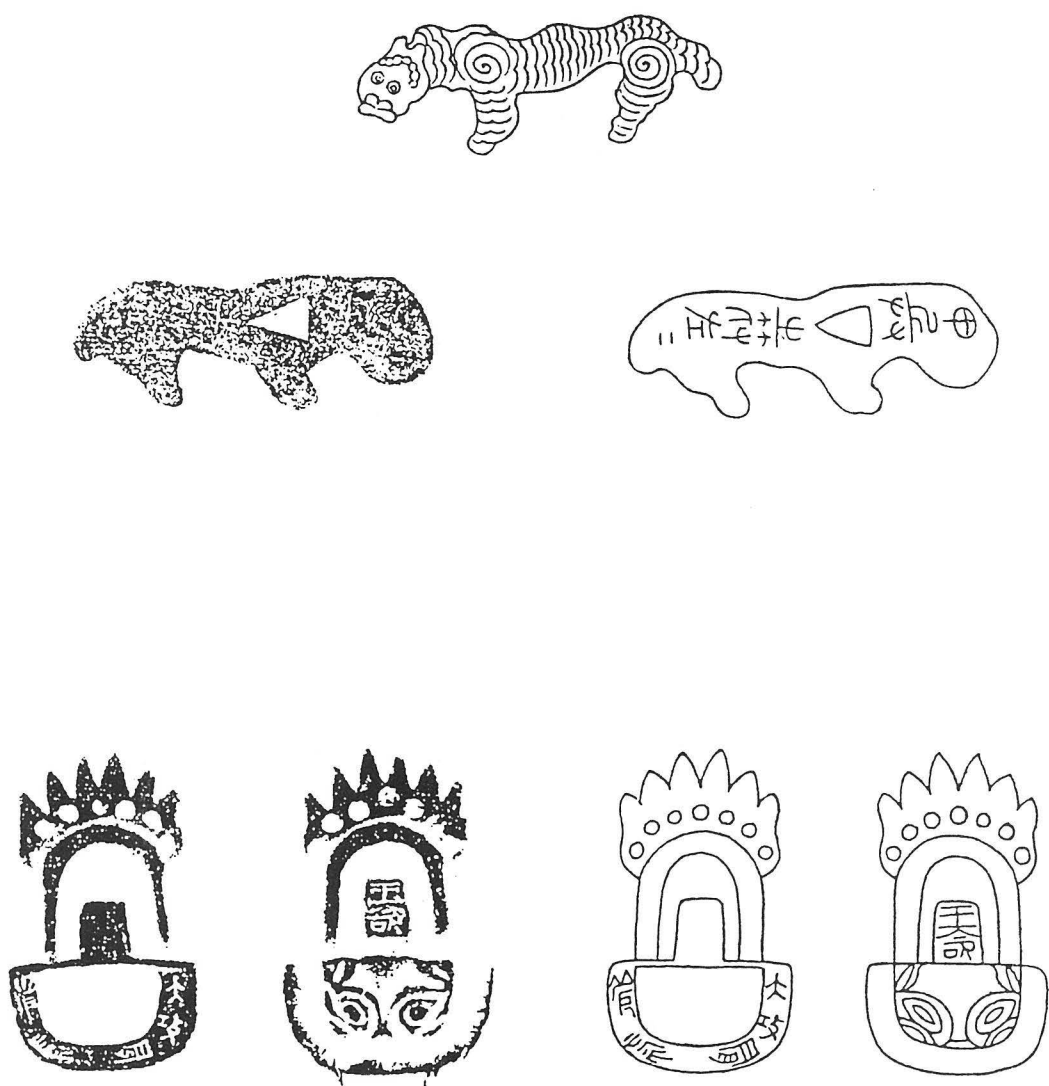
上左：韓將席信節

下右：李家浩摹寫

《增訂歷代符牌圖錄》上.2

《中國歷史博物館》101

題為「貴將軍虎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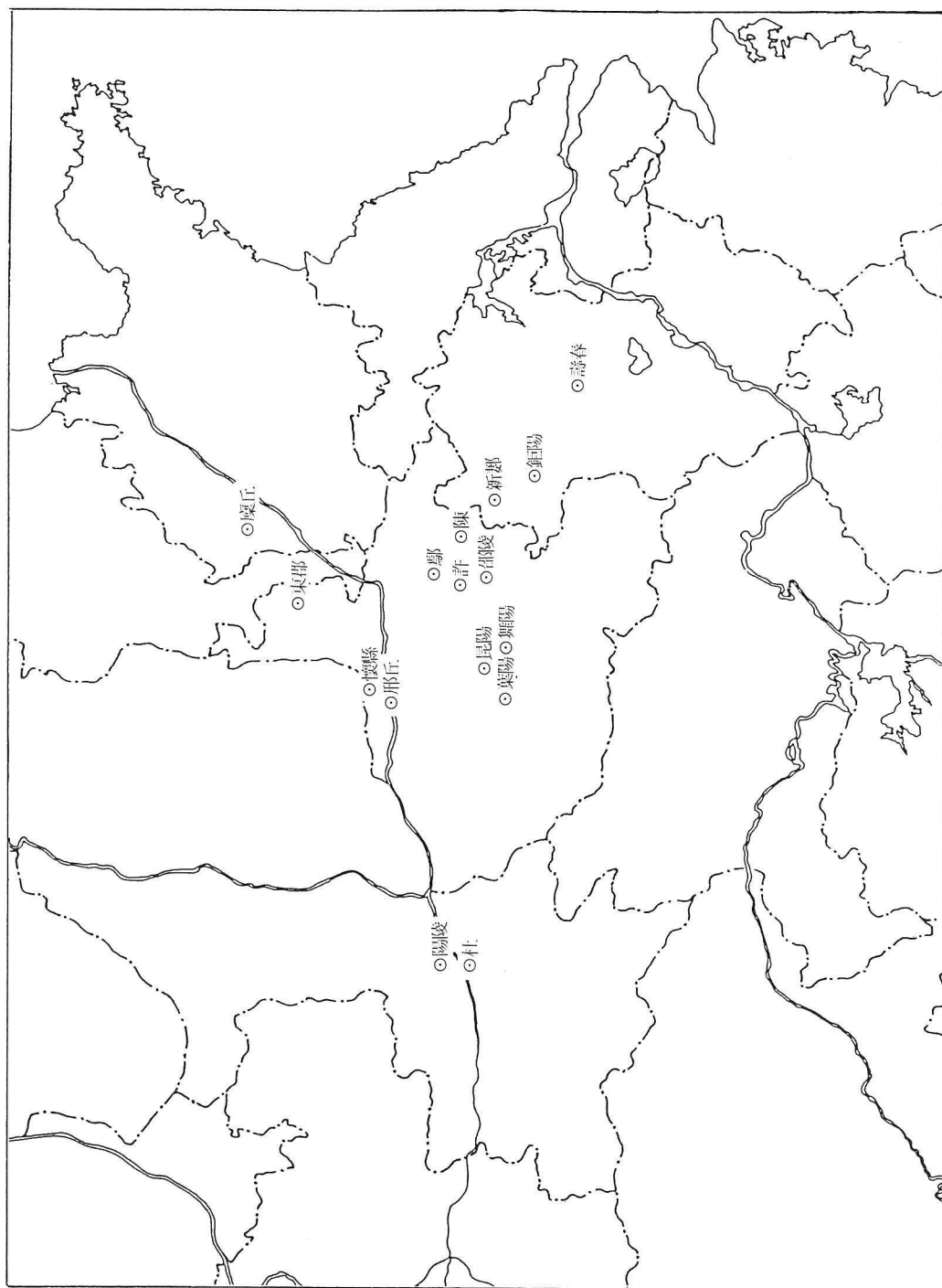
附圖十五

上：甲兵虎符

下：王命大攻有節

《善齋吉金錄·符牌錄》4

《善齋吉金錄·符牌錄》2



附圖十六 相關地名位置略圖